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 讯

第 4 期（总第 352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19 年 4 月 5 日

-
- ◆ 农业规划参考资料.....张仲威(1)
 - ◆ 百锻为字，千炼成句.....田增义(8)
 - ◆ 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尹永美(12)
 - ◆ 农村改革四十年回顾与感悟.....柯炳生(17)
 - ◆ 深切怀念最受尊敬的洪绂曾老学者.....郭书田(23)
 - ◆ 境外农业产业的发展概况.....朱丕荣(24)
 - ◆ 贵州农村产业革命的启示.....朱启臻(28)
 - ◆ 关于乡村旅游发展的若干对策建议.....于法稳 杨 果(29)
 - ◆ 乡村振兴应该“人出来，钱进去”.....陆 铭 周 静(32)
 - ◆ 德国乡村振兴的主要做法及启示.....叶兴庆 程 郁 于晓华(35)

农业规划参考资料

张仲威

一、做好充分准备

当您们进入各自履行规划使命的乡村之后，首要做的就是充分做好准备工作。“预则立，不预则废”。要打仗就要打胜仗，打胜仗就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为此，要做好以下三点主要的准备：

第一、组织班子

与村委会、党支部推选出来的成员共同组成一个规划班子，班子的带头人，必须是村干部中第一、二把手，规划师只能做带头人的参谋。

第二、统一认识

班子组成后，参与规划工作的全体成员一定要花一些时间学习中央有关文件，深入领会省地县各级领导指示，与此同时仔仔细细阅看村的有关资料。通过学习、讨论对诸如为什么规划、采取什么方法规划等等问题达到认识的统一，学习越深入，认识越深刻。如为什么规划，规划有什么好处等内容的认识越深入，对群众的宣传、动员、组织的作用就越大。

第三、过“三关”关

参与规划的同行人，虽然您们是志愿而来的，但您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城市、工矿（厂），对“三农”、规划、农村人文生态环境还不够熟悉适应。为此，我建议在您们各位精神上做好充分准备：生活上要过艰苦关；工作中要过艰难关；实行中要过艰巨关。这是农村规划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所决定的。为克服“三关”，就要树立，坚强地树立“三心”，即耐心、恒心和信心。只有这样才能打胜仗，达到实现规划的最终目的。

第四、群众认可

当您踏入乡村开展规划工作的第一天，要做好尊重群众的准备工作，即做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那样就行了。只要尊重他们，包括主人的地位、权益、接下来规划工作中的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就会开展起来。如在组织大、小会动员、宣传农业规划的好处活动时，群众就会积极参加；又如在制订规划方案过程中，群众就会献计献策；再如实现规划的全过程，群众会出钱、出力、捐物，这是无可置疑的，因为他们认可您们在真为他们做事。

二、为什么要推行农业规划

从农村来说，生产发展了，农民收入提高了，特别改革开放 40 年来，“三农”的状况发生较大的变化，随生产与收入的提高，对生活、环境等需求也日益提高。

从国家来说，随 40 年的改革开放，居民收入迅速提高，对农产品、农产品加工产品和劳务在质和量，特

别是质上的要求差距较大，与此同时，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存在不合理、不充分、不节约、不配套、不协调、不有序等等现象，造成资源浪费。

从国际来说，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虽步入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农产品、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产品和劳务，由于生产技术、方式落后，产品质量低、花色品种少、成本高，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采用什么方法解决或缓解上述从农村到国际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全国约 300 到 400 万座农村采用以农业规划为主体的农业区划、农业规划、农业计划、农业合同四位一体有机结合的农业科学计划体系（简称之为“三划一同”）是唯一的选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采用这一“体系”，总的来说，能明确指出农业向何处发展，怎样有序发展的方向、方法；能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组合生产要素、配置生产力布局；能充分发掘资源潜力，使之有效利用、节约资源；能实行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从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产品的质、量、附加值、增加农民的收入，能改善“三农”的生产与生活的农业生态环境；能使农民更富，农业更强，农村更美，达到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逐步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最终目的。

三、怎样推行农业规划？采用“三划一同”体系方法

前述，我在长期农业规划教学、科研和实践过程中，伴随着参与全国农业区划工作，深深体验到若要农业规划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以农业规划为主体，把农业区划、农业计划与农业合同四位一体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体系，即所说的“三划一同”，一环扣一环地进行，才能发挥其巨大作用。

“三划一同”具有相似性、差异性、联系性和序列性。其都具有以现在来推断未来的共性。它们之间又有各自不同差异，农业区划具有空间性，农业规划、农业计划具有时间性；农业合同具有时空结合的特性。四位之间又具有时空不可分开的紧密，相互依存的联系性及序列性，即农业区划为农业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农业规划、农业计划则是农业区划的具体化，农业合同是农业计划的落实，即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两者相结合的一种体现形式。

农业区划是根据自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地域差异规律，自然、经济、社会的条件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所推行的地域划分。其工作内容是推行对自然、经济、社会的状况调查研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及空间布局，据此，国家、省（市、区）的区划属宏观的，农村的被认为是微观的。农业区划的任务是在于为农业规划提供科学的依据。

农村的区划，由于村的面积小，规划师们应走遍其山山水水，访到家家户户，参阅完其件卷宗，从自然到经济；从村内关系到村周边关系；从村的优势到劣势；从资源潜在力到国内外政治、市场发展的趋向等都要进行周详的调查研究、分析判断、预测评估，以摸清“家底”掌握第一手资料，为农业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农业区划除为农业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外，还能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在了解了民情、农力之后，避免再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调查、不研究、不判断，少数人包办，闭门造车，从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半拉子工程”等浪费资源，挫伤群众积极性的弯路，再犯过去的错误。

农业规划是农业计划的长期计划形式，是“三农”向何处发展，怎样发展的行动纲领，是在依据农业区划的基础上指定的，它的作用：

1、高瞻远瞩。给群众有一个长远的打算，知道今年、明年、五年，甚至更长远的干什么，有什么变化，看到光辉的未来图景以激发群众改天换地点积极性。

2、合理开发、利用、保护资源。首先把人力资源、土地资源，充分开发出来，合理利用和保护起来，创造财富，潜力巨大。过去穷不是穷在资源，而是穷在人才。土地未有效地充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通过规划可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必生效，地尽其用，用必生金，穷也就必远去矣。其次，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方法不列述）。

3、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充分合理开发、利用、保护人力、物力、土地、自然资源的同时。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技能、提高产量、质量、资源利用率、无用变有用，小用变大用，一用变多用，降低成本，节约社会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实行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等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率。

4、协调有序。农业是个综合体，既包括农林、牧、渔生产原料的第一产业，又包括农产品加工、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及其部门的工业第二产业和包括旅游、商饮、教育、文化、卫生、交通等的第三产业。部门与部门、产业与产业之间、村与村之间、户与户之间相互存在着既联系又复杂又制约的关系，通过规划，才能正确处理，相互调节；才能避免农业生产的产品买难卖难的现象，农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所需要的用品供与求的矛盾问题，从而使农业内各部门、与各方面协调健康有序地发展。

5、非指令性的运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两只手，把“三农”活动纳入国家宏观规划之中。把国家、集体、个体三者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促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集体经济不断提高，个体收入日益增长，生活日益改善。

农业规划内容全国约 350 万个村，尽管山区、丘陵、平原、牧区、渔区、城郊区各异，但在人口、劳动力规划、土地规划、产业规划，其中主导产业规划、农业现代技术（水利化、机械化等）规划、信息规划、旅游业规划、基础设施规划，以及村内生产区、生活区、公共设施区的布局规划等内容是共同的。农户庭院经济规划许多地区作了重点列入。

人口、劳动力规划中主要几个指标是总量的发展、素质的提高，特别是人才的培养，永久牌的人才培养尤为重要。

产业规划中的重点是主导产业的确定，各产业与主导产业间的结构的达到合理化，必须花时间进行反复平衡，然后确定其量、质、速度。

现代技术规划中主要机械化、水利化的发展的规划，两者发展的限制因素较多、较大。如地块的平整使之规模化、机械的配套使之系列化、灌溉网络化等都要有较多资金、劳力的投入，在当前多数村有难度。

信息规划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信息网络的建设、大数据的应用，个别村可作试点，其他多数，绝大多数村还不具备应有条件。

旅游业规划不论是山区、丘陵区、林区、平原区或是城郊区，均应作较多的文章发展之。如要发展，首先在适宜的点把树（乔木—灌木）栽种起来，同时种植一些花卉和开拓一些草坪，会顿显村的旧貌换新颜的景观。

村庄规划是规划中的重中之重。因为它关系到居民生产、生活、经济、政治活动。村庄规划绝大多数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布局。若建新村，首选条件是水资源的量与质，其次是扩展到空间。

村庄规划一般分住宅生活区、工副业修配厂生产区和公共服务活动区三大部分。工副业生产区布局在住宅区的下风向，公共服务区包括学校、医疗、幼儿园、文体、商饮等应布局在居民方便的空间。

基础设施规划包括道路、供水、供热、供能（电能、风能、太阳能、沼气）等网络应做好设计与布局。由于投资较大，应因地、因村制宜。但规划时应尊重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急需的项目先实施，以提高群

众对规划师们信任和对规划的信心度。

农户庭院经济规划之所以列入农业规划内容，由于当前它仍是多数村或者说大多数村资金来源和劳动出路的重要渠道，是美化、绿化、净化生态优化的决定因素。它具有下列十大特性：第一，充分利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场所；第二，它是创造和积累农业再生产资金一座银库；第三、它是以庭院为载体的无教师、教室、教材、国家投资培养人才的学校；第四、它是农业生态优化的空间、决定因素；第五、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为市场提供第一、二、三产业产品，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和提供劳务的主要基地；第六、它是为最大利益的驱使，争先运用新技术和技术的潜在生产力变现实生产力的实验室；它是投资少，见效快、调头快，适应市场瞬息万变特点的微微型企业；第八、它是为旅游者提供食宿、娱乐、消遣的旅馆；第九、它是由粗放向集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经营形势的试验场；第十、不久的将来它是由生活与生产向生活与生态环境优化再转变为一座别墅型的乐园。

以上农户庭院经济的十大特点及作用不是高估，而是过去 1980 年代的调查典型归纳。农户庭院经济平均一个整劳力一年收入 2500 元。若一家四口，夫妇 2 人中 1 人外出打工，1 人从事村集体劳动，60-70 岁的爸爸为半劳动力加上 10 多岁的孩子半劳动力，即折为一个整体劳动力从事庭院经济，从中年收入 2500 元是不成问题的。全国 2 亿多农户若每户以一个整劳力从事庭院经济，从中年收入可达 5000 亿元。若二分之一从事庭院经济，则是 2500 亿元。这个数字要比国家从财政向农业拨款十年的总和还多。可见农户庭院经济仍是当前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其作用岂能低估！

农业计划是农业规划的细化，农业规划第一年的农业计划是在农业规划制定的过程中编制的。第二年至第五年的农业计划是继第一年计划执行情况，分期一年接一年编制的，不可能像农业规划进行中编制出的第一年计划详细、具体，因客观可预见和无法预见的政治、经济、技术、市场、自然等因素的变化，使原来规划中确定的指标、项目、措施，有的需要修改，有的需要增添，需要补充，也有的需要取消。如农业新科学技术的运用，又如资金特别是外来资金的到位情况不是预期，再如政策的改变以及自然灾害的产生等等变化，就迫使原来农业规划所提出的目标、项目、发展速度、和措施加以修改、变动。决不能认为计划订了就万事大吉。要因时、因势的变化而制宜，来完成农业规划提出的任务。年度计划的细目，因不同乡村、不同产业、不同主攻项目计划内容均不相同。但人口数量、土地面积、耕地及其他农用地与非农用地、总投入、总产量、单产量、总收入与纯收入、人均收入与纯收入、可支配收入等等发展指标都必须详列，保证措施也必须一条条落实。

规划的第一年度计划一定要付诸实现并与农业合同相接，第一年计划通过农业合同履行，且效果显著，必须使规划向深度发展。

农业合同是农业计划与市场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手段。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其作用愈来愈大，适用范围越来越广，即各种各样的合同或协议书在农产品的出售，“三农”所用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的购进以及劳务的输入输出，不论在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人之间运用农业合同手段签订协议书，特别是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数以万计的小农对接大市场，常依赖龙头企业、经济人、合作社等群体购销物流的范围越来越大的便利，农村资金、资源、资产等信息日益公开以及其他农村服务的日益开展，它的（农业合同、协议）作用与越来越完善的法制相结合，则越来越大。农业领域内产品的购销、劳务的输出输入之供与求的不平衡，买与卖难的状况，可以缓解或解决。劳动者再生产的积极性，经营者的主动性亦随之提高，无疑，农业合同履行之日，就是农业计划完成之时。

综上所述，“三划一同”四位一体有机结合，犹如捆绑带四级火箭把卫星送入太空一样，使农村更美，农民更富，农业更强，从而实现全面小康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一把利器。

四、怎样实现农业规划

农业规划制定以后，不是规划的结束，而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九千九百九十九步是付诸实现。规划的蓝图再美，方案再科学如不付诸实现，只能是一副美丽的图画挂在墙上，一具空文放在抽屉内，毫无任何价值。但实现的全过程中每落实一个指标，完成一个项目都是长期的、艰巨的、不是一蹴而成的。为此，要制定不同的年份，不同的措施。最主要的是下列几项：

首先，狠抓当年生产。狠抓当年生产使规划工作与之配合，这一举措抓好了。抓出成效，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丰收的成果，分配到了当年的收入，就必然激发出把规划执行下去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规划工作也就扎下了根。

其次、坚持群众路线。从进村到出村都必须是把尊重群众放在首位，贯彻始终。规划村的群众是主人，参与规划的外来者不论你来前是官还是兵，是教授还是干部，进村后都是客人，都是参谋、“打工者”，都是把客人带来的智慧、专长与主人具有的智慧与经验交汇在一起改变村面貌的建设者，而不是包打天下的主力军，更不是“救世主”。真正的主力军是村里的群众，真正的主人是村群众。在这个问题上外来者的态度必须端正，认识必须清醒。

第三、大办培训班。通过微观的村农业区划即摸清家底工作，从中了解到农村所以不美，农民不富，农业不强，不是资源短缺，也不是人口过多，而是素质不高，人才短缺，不是简单短缺，而是十分短缺。过去规划普遍的现象是先抓“物”，抓建设，抓拆迁，而不先抓人的素质提高，人力资源中的人才，其结果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为此，我敬请此次规划师们应把培训班作为规划的主要工作内容办起来，培养出一批批村未来发展所需要的永久牌的人才，这比建设鳞次栉比的住宅、新颖的娱乐场所、所谓的科技园区更加有功绩，更有价值得多。再重复一句，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资源，人才是第一资源中创新、创造、创建，最积极、具有决定性的资源，抓住它，就抓住了规划新时代农村发展的根本。

第四、资金的保证措施。为要使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农业强起来，不是一年半载的，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较长的时间；不是省钱省力的，而是需要大量的资金与劳动力。资金从何而来？报刊登载的许许多多美起来的、富起来的、强起来的先进典型，诸如安徽凤阳小岗村、江苏常熟市的蒋巷村、四川郫县农科村等他们所以农村美了起来，农民富了起来，农业强了起来，不是“等”、“靠”、“要”靠出来的，他们认识到：越等越晚，越靠越懒，越要越短，而是只争朝夕，一年复一年长期苦干、实干加巧干，干出来的，是用血和汗干出来的；不是靠国家拨款、银行贷款、外部捐款的外力，而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体智慧、挖资源潜力的内力，源源不绝的挖出来的。回忆 1975 年在河北省藁城册学村规划时，把古代滹沱河泛滥冲积成的村南百亩南大沙和村北约 30 亩沙疙瘩荒地开发了出来，种植当时较好的品种红星苹果，七年过后收获硕果，与此同时把千余亩大田作了调整，实行了规模化、方田化和集约化，产量大增，收入也随之较大增长。由于挖掘出新的潜力，合理利用了资源，财源也就随之而来了。

第五、加强经营管理。“法不能自行”。计划亦然，关键是跟踪巡察。年度计划确定以后，不是万事大吉工作的结束，而是计划执行的开始，和执行中的巡察，是否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某一资源新的潜力，如上述

藁城朋学村，是否发现市场新的变化，是否引进新的科技等等，若这些情况对原计划有必要进行修改时，应及时报村委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对之作必要的修改，以保持规划、计划的生命力，否则会成脱离实际，不适应发展变化的一具空文。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发现重大的新问题需要修改计划时，必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因规划及其计划是村的“宪法”，不能张书记（村长）来了一套，李书记（村长）来了又一套，所谓“一个班子一个记（村长）”来了又一套，所谓“一个班子一个纲”。村“宪法”必须有继承性、法治性，任何人不能随意更动，过去一些地方规划之所以失败，不是规划、计划的本身，而是一些人的违“法”造成的。

第六、加强上级对规划工作的领导。众所周知农业规划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通过实践的全过程，许多复杂人际关系、村的发展方向以及重大的举措如办培训班等问题，都必须在上级领导、指导下进行，决不能独立于上级领导之外，另搞一套，惊惶和防范过去在这一工作中出现的错误，走的弯路。

五、若干认识问题

第一、关于计划与变化的关系问题

群众中常传着这样一句话：“计划赶不上变化，还订计划干啥”，“还进行规划干啥”。无疑，计划、规划很多情况下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发展，但不要因噎废食。若无计划就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不仅危险，还使工作、生产、生活处于无序、盲目、无目标、东一榔头，西一斧的盲干、蛮干的状态，结果必是时间与资源的浪费，从而导致劳动效果极差，甚至是负效益的，导致生活的窘困，甚至破败。正如谚云：“吃不穷，穿不穷，计划（计算、打算）不到一世穷”。纵观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一些发达国家经常发生经济危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无计划或有计划不执行所致。我国建国70年特别改革开放40年所以步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农村较过去美了起来，农民富了起来，农业强了起来，国家的十二个五年计划，农村的计划、规划所起作用不能低估。

第二、关于“新”在规划如何理解的问题

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十九大之前，内容为20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内容也为20个字：“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序、生活富裕。”我理解的新农村建设包括两大方面的内涵，一是精神；一是物质。还要进一步理解精神方面的建设应放在首位。规划师们若能一进村把群众的精神，经过宣传动员组织起来，为其村改变面貌而作出各自的贡献，就是规划的一大成就。把当年生产抓起来，把树种植起来，把花栽培起来，使生产环境的改变显示出群众精神面貌的变化，这又是规划精神方面的内涵，若再进一步把家家户户的饮水、厕所、厨房等由旧的设施改变为现代化的自来水、马桶、厨具、燃具等设施；把农村旧的、不健康的风俗改变，同时又以民主方式推选出贤能，无疑使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要比兴建鳞次栉比的群宅，华而不实的科技园区要有价值得多，更比过去一些人搞规划，一进村就大手大脚向银行贷款，大兴土木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就认为这是新农村建设，只有这样才是“新”的错误认识和作法更要有价值，更符合当前国力、国情、民力、民情、村力、村情，更符合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心意。

第三、关于“度”的问题

这里谈的“度”不是态度的度，法治的法度。器量的气度的度，而是在农业规划中所涉及的每项指标，每个项目必须掌握的度。如供与求、收与支、高与低、快与慢、量与质等等确定时，要慎之又慎地、反反复

复地考虑确定之，一招不慎全盘受影响，如兴建某一项工程资金的需求时，一定要考虑到资金的供应；再如确定村某一产业的发展速度时，是快速，还是慢速，还是中速，在考虑、权衡人、财、物诸因素后再确定之。因诸因素间存在交错的、复杂的比例关系和制约性。据此，回溯到农业区划之所以强调“摸清家底”的重要性是不能不牢记的。否则，就会盲目贷款，债台高筑。强迫集资，民怨沸腾，从而影响了农业规划的全局。如何掌握度？说易行难。我过去的做法是通过调查研究所取得的较实在的数据资料与现有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技术，再与可以挖掘出的潜力能变现实力的评估后的总“供”量与总“求”量的相对平衡，即所说的“适度”。以此确定某一指标。如某一规划指标发展速度过快，人力、资金“供”不上，若执行，不是债台高筑，就是半途而废，造成资源的浪费；若发展速度过慢，规划便失去意义，也是资源的浪费。所以要求规划师们在确定任何指标时，确定其适度要花功夫。

（作者：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2019年1月15日）

附：

送关于农业规划参考资料给四川省规划师们的一封信

尊敬的规划师们：

您们在党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正确决策颁布之后，全国首批被四川省聘任，不畏艰苦，到“三农”中去，承担规划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值得尊敬，值得庆贺。

我已年逾94岁，从1954年起至2014年的60年间，一直在教学、科研、实践农业规划工作，可以说您们是我的新同行，为此，在您们正奔赴或已经奔赴农村之际，冒昧地把我曾在全国一些省、地、县、乡、村、农场等不同级别、不同类型、不同历史时期百余处规划实践基础上所撰写出版的书籍、报刊上登载的文章，以提纲挈领的方式，归纳组合出这份资料，提供您们作一点参考。对我来说老有所为，对《乡村振兴战略》做点贡献。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致礼！

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

张仲威于北京

2019年1月15日

百锻为字，千炼成句

一一纪念《中国消灭牛瘟的经历与成就》出版 15 周年

田增义

《中国消灭牛瘟的经历与成就》2003 年出版了。这部著作是在农业部畜牧兽医局的组织、领导下，由全国当年参加过牛瘟防疫、牛瘟弱毒疫苗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健在的老战士们共同完成的。编委会由消灭牛瘟的领导者、组织者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农业部畜牧兽医司司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程绍迥博士任名誉主任委员，副司长陈凌风为主任委员，副司长冯静兰、农业部首席兽医专家尹德华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沈荣显院士、高级兽医师鲁荣春、彭匡时组成，尹德华为主编。出书的目的是遵照程绍迥、陈凌风的一再嘱咐“将消灭牛瘟的全部经历、成就、经验、技术资料总结出来，编印成册，留给后世”。这是一次大型编辑活动。

1956 年我国消灭了危害千年、农牧民为之谈虎色变的牛瘟。除民之患，如祛腹心之疾。在农耕社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不仅具有重大经济价值，而且有着非同小可的政治意义：荡涤牛瘟，巩固了土改成果，农牧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在他们心底里树立了共产党的威望，拥戴党的领导。新旧社会两重天，人民群众感觉生活在新中国有了奔头，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我国老一辈畜牧兽医工作者们消灭牛瘟，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成就

根绝牛瘟，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战争年代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告捷。当年社会治安状况严峻，交通、通讯不畅，防疫装备很差，兽医科技人员奇缺。在危险、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灭绝牛瘟的伟大胜利，成绩来之不易。

从 1956 年我国廓清了牛瘟，到 1993 年组织编写《中国消灭牛瘟的经历与成就》，再到 2003 年正式出版，半个世纪随手过，万事更新转头空。其实，程绍迥、尹德华和当年参加消灭牛瘟的中流砥柱们，此时在世的都已是古稀或耄耋之年的老人了。白首相逢征战后，未闻暮鼓仍战斗。须眉虽白赤心在，抖擞精神新黄忠。消灭牛瘟，速度之快，之彻底，非我自负，实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称得千古独步。灭瘟除害曾尽瘁，而今泼墨忆军威。培训青年无数计，群策群力无不摧。夜半制苗连轴转、打针赶在出圈前。牢筑牛瘟隔离带，分隔疫区逐个歼。消灭牛瘟亲历事，欲倾上天河汉水，写尽为民惓惓心。他们只有一个心愿，经验传世励后昆。有的人不能动笔了，躺在病榻上口述，由身边的人代笔也要将这段经历记载下来。

程绍迥博士带头撸袖攘襟，带病写回忆录《半生倾情灭牛瘟》。书稿未完，中道殒谢。临终前，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陈辞。他把亲密战友尹德华叫到病榻前，将书稿交给他，说：“我不行了，你替我完成吧”。黄金难买亡人笔。尹德华含泪领命，继续组织编写《中国消灭牛瘟的经历与成就》一书。

从农业部畜牧兽医局 1993 年发文，号召各省提供当年消灭牛瘟的资料，到 2003 年《中国消灭牛瘟的经历与成就》出版，历时十年。主要原因是前辈们不会操作电脑，年迈手抖，写的字难以辨认。老年人思路大不如前，心欲言而笔不速，文稿段落零乱。在这十年里，编委会又有人陆续辞世。在世者年事太高，行动不便，编委会连一次会议也未开得起来。

尹德华是本书的主编，当年防治牛瘟的亲历者。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战斗到共和国成立之后，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转战到康藏高原，这几个顽固疫区最后消灭牛瘟，都有他的汗马功劳。而且，无论工作环境条件多么危险、艰苦，他都坚持写工作日记。因此，他的资料也最多。他积劳成疾，带着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每日干到深更半夜。不仅如此，他还要照顾偏瘫二十载的爱人。

老战友彭匡时了解他，几次打电话，请求来京协助。尹德华想：“你比我年纪还老，这么高龄的人来京，实在不便，也没有资金支付你的差旅费。”心意领了，为了大家都平安，只好婉言谢绝。

尹德华写的文章大多是抄录或摘录当年的书面报告或日记，再用文字把它们串接起来，形成现在的回忆录或论文。大白话，读来原汁原味。

书里不少作者也有类似情况。当年制苗、防疫怎么说、怎么做的，现在就怎么写。平时说“兔化毒、山羊毒、绵羊毒…”，其实是“牛瘟兔化弱毒疫苗、牛瘟兔化山羊化弱毒疫苗、牛瘟兔化绵羊化弱毒疫苗…”。省略了定语“牛瘟”二字。干工作的人彼此都明白是什么意思，理解、操作上不会产生差错。然而，牛瘟彻底消灭以后半个多世纪，现在的年轻人再没见过、甚至没听说过牛瘟的人，读来不免有匪夷所思之感：“怎么兔毒、山羊毒、绵羊毒和防治牛瘟搭界了？”

书的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冯静兰，看了三校稿后曾提出再修改建议。然而尹德华考虑：修改后变动较大，拖延出书的时间要长。

“消灭牛瘟”是老先生们一生所做最辉煌、最感自豪的一件事。他们生怕在有生之年见不到这本书面世。天下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在众人的催促下，出版社和尹德华商定：不改了，就按三校稿印刷。

《中国消灭牛瘟的经历与成就》一书终于在 2003 年 10 月出版了。出版前夕（8 月 18 日）尹老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并且在书里给我安了个头衔“特邀编校”。实在过誉了！这本书出版 15 年了。十五年来我的心一直忐忑不安：作为后生，我有何德何能担得了这么重的职责！仔细揣摩，这是尹老对我的嘱托、激励和期望。

信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增义战友：

您好！今天整理东西，发现 3 个月前写的信，贴上了邮票还未发出。打开后重新写一下近半年来的情况吧，会使您为牛瘟这本书分忧。附上当时准备送你的材料（冯司长的修改建议），也可以略知一些概况。

早在 3 个月以前，忙于理顺书稿个别文字，同出版社责任编辑约定，这是第三次校样定稿。编辑叫我签字即上版开印，不再变动了。3 月 18 日编辑派印刷厂的同志来取走书的三次样稿，打了收条，我签了字，注明印书，不再变动了。

后来，编辑为慎重起见，5 月 5 日把书样连同我补送的一些像片等寄给冯静兰同志终审冯认真负责，抓得

很紧，5月10日即提出了修改意见，然后把书样和她本人所写“建议”寄还给编辑。冯建议编辑和我再做些文字修改加工。

编辑在电话上向我征求意见，她感到一改动文字，就得变动全书的页码和篇、章、节目录，难度太大。

我请编辑把冯的意见信复印，寄给我和老鲁。我看后感到建议很好。可惜时间上太迟了，更不敢再送京外编委们提意见了，怕再拖延一年，书还是印不出来。不能再拖了！我便打电话，要求冯司长放弃严格把关的要求，不再改动文字了。历史文集难能做到那么十全十美。照原来三校样本上版印书吧。冯司长立即表示同意了。我便打电话通知编辑不再修改了，照样书上版快出书。

6月初，北京防治“非典”进入高潮紧张阶段，大家都不能外出。编辑提出邀印刷厂的人一起来东郊开会，商谈印书出版经费安排。

我给冯、鲁（荣春）及畜牧局打电话、商量，都不赞同开会。北京和全国正在防治“非典”，都忙，不宜找办公室或在街头公园开会。我及时答复了编辑，请她安排出版。（我的）老太婆病况加重，靠填鸭式喂食物，维持生命。我也病倒了，顾不上出书的事了。

近两个月没有消息了，突然间畜牧局有人打来电话，催问出书事。在学习《三个代表》的党支部会上，也有人提出：各省催问《牛瘟》这本书，怎么难产了？

还有，中国畜牧兽医学学会决定9月召开学术年会和全国理事会，同时为陈凌风老理事长庆寿（九十大寿），畜牧兽医学学会考虑为消灭牛瘟功臣祝寿，可拿这本书出来就礼。这下子我就抓瞎了，只好催问编辑同志。

我对编辑讲：请出版社恪守诚信，抓紧完成，别再叫我为难。万一我病倒，难道还得留下遗嘱，交还畜牧局处理？

直到昨天，编辑未正式答复，她说“明日（指8日）找印刷厂谈后答复我”。今天还未来电话。

睡不着觉了，朝不保夕之年，起来写信，通个消息。如有你在京，我可多个耳目，现在孤家寡闻了。此书拖拉十年未见成果，委托冯办。鲁因病第三次住院，才出来，尚不能办事。不多写了，通个信息。你为此书出了大力，谢谢。

尹德华草书，03年8月18日夜。

我看了这封信，辗转反侧，夜不成寐。我崇敬的老师长、忘年之交，您真的体力难支了吗？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未形。尹老带病给我写的这封长信，经过三个月的深思熟虑，不辞劳苦，把它又重新抄写了一遍才寄出。情深意切，因事晓喻。惓惓之意，感人肺腑。

程老长尹老二十岁，尹老又长我二十岁。素日他们从来直呼我名，而在这封信里称我“增义战友”。称呼升格，然而也折煞小字辈了！言有所未尽，意有所未竭，尹老用意深邃。我不是当年消灭牛瘟的亲历者，更不是本书的编委成员，明言让我为这本书“分忧”是也。这可能是安排我作“特邀编校”一职的良苦用心吧。老先生们在世，“天塌下来大个子顶着”，我只不过是大树底下乘凉的一份子。如今，“大个子们”纷纷辞世，“顶天”，晚辈责无旁贷了。

中国消灭牛瘟的经历、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独特的，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和任何其他国家。把它总结出来，编印成册留给后人是一辈兽医工作者们的苦心所在。书里存在的缺点，编委会已经有所察觉。然而，他们感到剑老无芒，人老无刚，西夕之景，岂可久长。妄念一樽酒，再与细论文。仓猝之间出书了，压在尹老心里的重担终于落地了。

我带着问题学习这本书，体会前辈们的革命精神和初心。老一辈兽医工作者们能用七、八年时间，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完全、彻底消灭最凶悍的牛瘟，“真牛”！我每读一遍，总闻防疫指战员们为解除农牧民“十年集富不易，一场瘟疫倾家荡产”的悲剧反复上演的忧虑，“明知边塞苦，纵死愿留侠骨香”的大无畏气概。他们每个人都有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书里所述，仅是总结，多数人未写故事细节。

人类探索世界，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回到实践，如此往复循环，步步深入。失败是成功之母，消灭牛瘟的征程也是如此。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应写，克服了困难，找到了制苗、防疫失败的原因，就是向成功前进了一大步。只写成功，不写挫折，只有红花，没有绿叶，所求无不得，所欲皆如意，让读者容易产生“消灭牛瘟，一镢头挖出了个金娃娃”。科学上哪儿有一蹴而得之事？

1951年西北兽疫防治处在甘肃岷县防牛瘟，一时粗心，选试验兔不当，酿成死人、死牛、死狗的惨剧，惊动了公检法。总结工作、处理事故，都是麻缠事。然而，防疫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如此惊心动魄的大事，在书里仅仅是两行“注释”的小字而已。

年迈忘性大。前辈们在正文里，有的人写到后面，忘了前面，文章里重复内容不少；时间前后秩序的安排常有混乱；有人写的回忆录，话匣一开就是一大段，段落不分，标点随意，使读者感到乏味。冯司长举偏补弊，提的修改意见很中肯。

消灭牛瘟，成就辉煌，举世无伦。《中国消灭牛瘟的经历与成就》出版，事业成于前辈手，故事出于战士口，这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屈指掐算老编委，故人辞世已无几。如此骄人的业绩，丰富的素材，很希望由农业部兽医司重新组织人选，做书的修订工作。文辞学（

司马）子长，诗词学（自）乐天，在文字上下功夫，百锻为字，千炼成句，反复锤炼，再出修订版，使其与这项成就交相辉映，以不负前辈们的初心和期盼。（注：司马迁，字子长；白居易，字乐天。）

《中国消灭牛瘟的经历与成就》出版15周年了，本书的主编尹德华已经辞世4周年。为了纪念缅怀老一辈兽医工作者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德，尹德华的女儿尹永美将其父亲留下的一些文稿和回忆录及宝贵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审校，编辑成书，书名是《踏遍青山人未老》。书里选用了一些尹德华当年的老领导，老战友，老同事的回忆文章和信件，还选用了尹永美写的文稿。书里选用了第一任农业部长李书城和第一任党委书记张增敬当年为农业部先进工作者写的题词，还选用了一些珍贵的照片。何康老部长特为本书题词，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同志为本书作序，贾幼陵司长和才学鹏所长都写了文章。

这本书在中国农业出版社养殖分社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已经定稿排版，即将出版问世。
中国消灭牛瘟的伟大成就水载史册！

中国老一辈兽医工作者的鞠躬尽瘁和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

尹永美

我父亲名字叫尹德华，他于 2014 年不幸病故，享年 93 岁。父亲生前是农业部畜牧兽医总局的兽医老专家。他一生致力于研究疫苗，防治动物传染病。为了中国兽医事业的发展和壮大，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父亲重病期间，我整理他的东西，发现他保存了很多书籍和上百本日记，还有许多信件和历史资料。我经过整理，把他的技术书籍装箱，抄好目录，捐献给兰州兽医研究所图书馆，共 11 箱。（今年又捐献了 4 箱。）

剩下的日记和资料（包括照片），我看后萌生了写作的念头，因为这些资料是中国兽医史的宝贵记载，是中国老一辈兽医工作者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的体现。为了弘扬正能量，2013 年，我开始编辑审校，准备出版一本书：《踏遍青山人未老——父亲的人生足迹》。

经过 3 年的努力，书稿基本完成，这本书共有 55 万字。书里选用了何康老部长的题词——“尹德华同志为发展祖国的兽医事业建立的殊勋不朽！”，还选用了农业部第一任部长李书城当年为农业部先进工作者写的题词，（父亲于 1956 年被评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参加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获得奖章一枚。以后的年代里，他也多次获奖。）还有农业部第一任党委书记张增敬同志当年的题词。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同志写了序言。书里选用了农业部兽医部门几位领导同志写的缅怀纪念文章，选用了父亲的回忆录及他的老战友们的回忆录及文章。还选用了我本人写的几篇文章以及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郭书田同志在序言里写到：“这本文集是我国农业的史书，传书，是我国一份宝贵的农业文化遗产。这本文集的出版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

2016 年 10 月，书稿送到中国农业出版社养殖分社，经过有关领导审阅后，决定资助出版。两年来，出版社责任编辑周晓艳同志和我本人反复进行了四遍修改和校对工作，在出版社有关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本书已经定稿排版，即将出版问世。

迎难而上

我今年已经 70 多岁了，患有高血压，腰椎病，骨性关节炎等老年病，心脏也不太好。几年来，为了这本书的编辑审校和出版，我用老前辈的革命精神勉励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和辛苦。

2016 年春寒料峭的季节，停了暖气后，屋子里很冷。我每天坐在电脑前校对书稿，《志同道合，心系牛

羊》是一篇 5 万多字的文章，由于文字多，涉及到一些历史事件，难免有硬伤及语句不通顺的句子和错别字，需要仔细审校。我每天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有时连续几个小时不活动，工作了一周。有一天下午，我突然站不起来了，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右腿抽筋样地痛，只能拄着拐杖扶着墙走路。吃药、抹药、热都不管用，只好到医院去扎针灸。日复一日，连续扎了一个月，才痊愈。

2017 年夏天，我住的农丰里的房子进行老旧楼改造，工程很大。由于我家住在一楼，地面有塌陷的地方，置换上下水管道很麻烦。工人们把地面挖了几个大深坑，房顶凿了几个大洞。每天电钻轰鸣，尘土飞扬，蚊子叮咬。我坐在房间里关上门校对修改稿件，仿佛处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之中。为了加快进度，我迎难而上，只有一个心愿——争取早日完成书稿的审校工作。

在打字录入“牛瘟日记”时，我遇到了困难。父亲当年的日记本很小，字迹又小又密，很多繁体字难于辨认。我逐字逐句地“翻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揣摩，争取原汁原味地录入，还原当年老一辈兽医工作者为了消灭危害千载的“牛瘟”恶魔所做的艰辛努力，还原他们的战斗精神和丰功伟绩。我在录入这本“战地日记”时，几次被感动地热泪盈眶，受到了深刻的洗礼和教育。这本“牛瘟日记”我整整打字录入一个月。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几乎都是坐在电脑前工作。

《踏遍青山人未老——父亲的人生足迹》这本书，通过父亲的回忆录和许多老战友的回忆录及很多历史资料，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老一辈兽医工作者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带领防疫队到内蒙古大草原和康藏高原防治牛瘟的光辉历程。他们走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爬雪山，卧冰川，吃糌粑，喝雪水，住帐篷。有时还要露宿在山坡上或者大树底下。他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做好当地领导干部和牧民的思想工作，他们亲自研究制作疫苗，跋山涉水，顶风冒雪给牛群注射。父亲带领防疫队连续六年战斗在消灭牛瘟和口蹄疫的第一线。在这六年中，他有四个春节没有在家里过，留在东北的家属连续四次搬家，他都不在家。他在康藏高原防疫，两年没有回家。他曾几次遇险，一次负伤。我国政府于 1956 年宣布：中国消灭了肆虐横行，使农牧民倾家荡产的牛瘟！

联合国粮农组织于 2011 年宣布：全世界彻底根除牛瘟。我国整整提前了 55 年！这是全世界在消灭“天花”之后，第二个消灭的动物烈性传染病，是兽医史上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

我国消灭牛瘟后，父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防治口蹄疫和其他动物疫病的工作中。1958 年，他在兰州兽医研究所主持研究出我国第一个口蹄疫疫苗，后来又研究出 2 种口蹄疫弱毒疫苗。他在中监所工作期间，主持研究成功“羊痘弱毒细胞培养制苗”。为了防治动物传染病，父亲走遍了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

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会激励和鼓舞后代们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在奔向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上迅猛疾跑。这也是我编写这本书的初衷。

砥砺前行

我三岁时，不幸患了小儿麻痹症，右腿落下了残疾。“身残志坚”永远是我的座右铭。张海迪的精神鼓舞着我，许多自强自立的残疾人模范是我的榜样。我的晚年，生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对残疾人

关心照顾，实行了很多好政策。我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在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鼓舞下，不忘初心，撸起袖子加油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做有意义的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砖添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几年来，我积极写作了一些小文章和诗歌，有9篇散文在“北京晨报”刊登，有4篇散文在“北京晚报”刊登，还有5首诗歌和4篇散文在“春雨报”刊登。前几年，还有几首诗歌发表在《六里电社区报》上。“搜狐网”和手机微信“皇城根胡同串子”上也不断发表我写的一些小文章。读者说，我写的文章接地气，朴实生动感人。这是读者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要不断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和写作能力，在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舆论阵地上做一名合格的战士，做一棵不老松！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

（一）情思老家具

2017年夏天，我住的农丰里的房子开始老旧楼改造，由于一楼地面塌陷，挖了好几个大深坑，无奈只好进行装修。

由于来不及找周转房，屋里的东西多，只好这屋挪那屋，来回挪动。老家具被淘汰了很多：双人床，大衣柜，写字台，书柜，小橱柜，八仙桌，单人床，木箱子……有几件因为在大南屋放着，装修时抬到了阳台，侥幸得以逃脱。这些老家具收废品的不要，送给别人，都说没有地方放。看到父母留下来的老家具弃儿一般散落在院子里，忍受着日晒雨淋，等待着工人们把它们拉走，我的心里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儿。

这些老家具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陆续来到我家。其中一个写字台和八仙桌是1954年我家刚搬到北京时，农业部租给大家的，那时单位每个月都从父亲的工资里扣租金。80年代以后，这些家具就免费送给大家了。父亲在世时，总是说：“你们不要嫌弃老家具样子旧，它们可都是好木料，做工也好。”

那个八仙桌是我家的功臣。母亲病倒前的几十年里，她白天在这张桌子上为我们擀面条，蒸馒头，包饺子，做各种吃食。晚上，在这张桌子上为我们做棉衣，熨衣服，做各种针线活。儿时，我和小伙伴们在这张桌子上写作业，画画，打牌，下棋，玩游戏。一日三餐，全家人围坐在这张桌子前吃饭聊天，其乐融融。

这个“功臣”为我家奉献了50多年，桌面裂了缝，父亲请人用装修用的密度板在上面贴了一层，又用了10多年。

有一个木箱子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父亲找人做的，木头本色，没有刷油漆。朝鲜战争期间，政府为了疏散人口备战，那个木箱子跟着我家从沈阳搬到萨尔图（现在是大庆的一个区），从萨尔图搬到哈尔滨，从哈尔滨搬回沈阳。1954年，它跟着我家搬到了北京。

我家四次搬家，父亲都不在家。他从1949年到1955年，连续六年带领防疫队在内蒙古大草原，宁夏，川北，康藏高原防治牛瘟和口蹄疫。

1969年父亲跟着农业部全体干部下放到河南西华五七干校劳动，这个箱子也跟着去了。父亲用毛笔在箱子的侧面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地址、姓名，因为需要托运到河南。这次淘汰这个箱子时，我泪眼婆娑地看着父亲隽秀的字体，思绪万千，心头涌起波澜，真是不忍心把这个箱子扔掉。

这些老家具里我最舍不得的是那个大衣柜。那个大衣柜是两开门的，一面是整扇玻璃，另一面镶有穿衣镜。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买家具要凭票，父亲的单位做了一批大衣柜，因为北京穿衣镜不好买，所以就“门洞大开”送到家，每家交了60元。为了给这个大衣柜安装穿衣镜，父亲到湖南出差时，请住在冷水江的姑姑买了两块方镜子，合起来就是一个大整块，然后用纸板把它夹住，捆好。父亲小心翼翼地把这面镜子背到了北京。说来也巧，父亲出差离京后，单位买到了镜子，于是挨家挨户给装好了。父亲背回来的这面镜子一直保存着，由于换房搬家，东挪西放，这面镜子也就无人问津了。这次装修房子，我发现了它，打开一看：裂了几道缝。父亲千里迢迢背回来的镜子成了碎玻璃。

这个大衣柜虽然用了30多年，但是品相完好。母亲生病卧床的年代里，我经常住在父亲家，父亲就让我使用这个大衣柜。大衣柜下面的两个抽斗分别放着父亲的相册，几本父亲写的书及买“房改房”的房产证及各种手续的原件。上面三层放着我的衣物。

工人们把掏空了的大衣柜抬到院子里，有几家邻居想收留，但是因为又沉又大，他们犯难发憊搬不动，这个大衣柜只好可怜兮兮地站在院子里。我看着心疼，夜里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第二天清早，我看到有工人路过，就赶快叫人把它抬回来，暂时放到门厅里。等到门厅铺地面时，工人们看到没有地方放，又把它抬到院子里。夜里，小雨淅沥淅沥地淋着它，我的心纠成了一团。次日早晨，我第二次找工人把它抬了回来，放到小北屋。等到小北屋铺地面时，想把它搬进大南屋，难题来了：工人们抬着它在门厅三个门之间转不开，无可奈何，命运多舛的大衣柜第三次被送到院子里。

由于工人们太忙，没有时间及时拉走这些老家具，它们的厄运来了：路人看中了大衣柜上那块大镜子，于是骑着平板车，带着工具来拆卸。他把柜门撬下来，然后拆下镜子，放到平板车上拉走了。我在楼门口看到了这一幕，心如刀绞，眼泪在眼眶里转。

有几件老家具刚抬出去不久就不见了，估计有人用得上，搬走了。它们也算找到了好归宿。其余的前景渺茫，不知去向何方。

这些老家具经历了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经历了风雨坎坷，它们承载着历史，承载着家国情怀。它们凝聚着父母的辛劳，凝聚着父母勤俭节约的美德，凝聚着父母的爱。

（二）我家的月季树

我家住在一楼，南窗前有一棵月季树，树高3米多，枝叶繁茂。每年5月到11月，几十朵娇嫩粉艳的“花中皇后”竞相开放。青翠欲滴的绿叶中镶嵌着雍容优雅的花朵，淡淡的花香，令人心旷神怡。过往的行人驻足观看，赞不绝口。

这棵月季树是我父亲 20 多年前亲手栽种的。每当我看到这棵多姿多彩的花树，就会想起父亲，想到他的慈爱和高尚品德。

这棵月季树刚来到我家时，只是一棵扦插的小枝条。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它努力地往下扎根，汲取着大地的营养。由于前边有栅栏，后面是窗户，很难浇水施肥。每年春天都有工人给路边的冬青灌木浇水，我们就请工人顺便给它喝个饱。我有时把窗户护栏的一扇活动小门打开，把一些淘米洗菜水泼给它。无论有水无水，它从不抱怨，只管向上生长。看到它生机勃勃的样子，我们舍不得给它剪枝条，于是它就自由自在地随意生长，从最初的小苗长成了超过一层楼高的大树！

去年 5 月这棵大树遭到了劫难。由于老旧楼改造，工人们开始搭建脚手架，那些粗铁管穿过月季树的枝条，折断了一些嫩枝，枯萎的枝叶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脑袋。但是它宁折不弯，在夹缝中求生存。一场小雨过后，一朵朵俏丽的粉色花朵从脚手架的空隙中笑嘻嘻地探出头来，惹人怜爱。

秋天，保温墙面做好后，工人们拆除了脚手架，开始埋避雷针。工人跟我商量：“您家那棵月季树能否拔掉，避雷针要埋在地下。”我着急地连声说：“千万不能拔掉，这棵树已经 20 多年了，这是我父亲留下的念想！”为了保住这棵树，我冥思苦想，到处给朋友们打电话，发微信，希望朋友们能帮助这棵树找个好去处，让它继续活下去。一个热心的邻居说：“这棵树不用移走，让工人们连土挖出来，放到墙边立着，等到埋完避雷针，再把它栽上。”“好主意！”我高兴地鼓起掌来，立刻把这个想法跟工长说了。工长听到这棵树的来历，理解我坚决保住这棵树的心情，就让工人们把这棵树作为结点，两边的避雷金属片在这棵树的前面汇合了。这棵饱经沧桑的月季树安然无恙地度过了难关。

今年夏天酷暑难耐时，楼房南面的破旧栅栏拆除了，准备安装新栅栏。拆除旧栅栏时，这棵月季树失去了依靠，一下子倒伏在人行便道上。傍晚，我心疼地跟儿子说：“用一根绳子把树干拉起来，拴到窗户的护栏上才好！它躺在那里真可怜！”儿子赶快找了一根旧电线，穿上长袖衬衫，长腿裤子就到院子南面去了。

我站在窗前往外看：儿子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扶不起来这棵大树。我大声：“不行！一个人弄不了！就让它先待在那里吧！它的树干不会折，它不会死！”儿子无可奈何地回来了，手上，腿上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大包。

第二天上午，我时不时地站在窗前往外张望：担心这棵躺着的月季树受人欺负。还好，过往的行人都小心翼翼地从我旁边走过，他们心里明白：这棵月季树还会站起来！下午 3 点多钟，工人们开始安装新栅栏，这棵月季树被扶起来，紧紧地靠着新栅栏，昂首挺胸地矗立着，向过往的行人致意。那些隐藏在树叶中的花朵们挺直腰板，喜笑颜开地频频点头。

人生如树！我们每个人的生之路都是不平坦的，充满了困难和挫折，我们要向这棵月季树一样坚初不拔，百折不挠！让我们的人生之树开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作者：原农业部兽医局离退休干部尹德华之女；2018 年 12 月）

农村改革四十年回顾与感悟

一一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纪念农村改革四十周年研讨会”上特邀报告

柯炳生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对农村改革开放四十年进行纪念和回顾，很有意义。刚才辛贤老师讲得很好，视野很宽阔，很有深度。郭沛老师讲了经管学院十几年的发展变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成绩。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学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过去的四十年，对于我和何秀荣老师这个年纪的人，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是这四十年亲历者，有着非常深刻的亲身体会。我很高兴有机会对过去的四十年农村改革做些回顾，谈点感受和感悟。

40 年来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天翻地覆，举世公认。这些发展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革。改革就是制度的变化。制度的变化，包括了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我想概括为四个方面。也可能更多，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四个方面是最重要的：首先是土地制度，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第二是市场制度，是农民和市场的关系；第三就是税收和补贴，是农民和收入的关系；最后是就业制度，是农民与就业的关系。

首先，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是最主要的一个制度。40 年前的农村改革，就是以小岗村大包干为标志开始的。这个大包干的方式，其实很早就有过。50 年代，60 年代，各个地方都先后试行过，但星星之火没有燎原，由于各种原因被压制下去的。大包干的含义，具体内容是三句话，“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官方的称谓先后有多次变化，开始时叫“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后来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现在进一步简化为“基本经营制度”。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这个土地制度改革的意义何在？很多人在讲到当年小岗村改革时，关注的焦点是土地的分与合。我总觉得这没有说到根本上。小岗村的改革，我认为，本质上是建立利益机制。改革前，实行集体劳动，工分制，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没有多少差别，是吃大锅饭。每个人劳动付出程度和劳动的效率，与实际获得的报酬，是不挂钩的，没有直接联系。实行大包干后的三句话，实际上是实现了按劳分配，干得多少好坏，直接有重大收益差别。

让个人的收益直接与劳动效果挂钩，非常重要。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关键基础。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利益机制，市场的作用就无法实现。市场机制的作用，就是价格的作用。如果生产的收益不直接归具体的生产者，那么，无论价格怎么变化，都与生产者的收入没有关系，价格也就不能发挥出调节生产的作用。大包干的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这件事。至于是分了还是合了，只是形

式变化，不是最本质的东西。听说小岗村的土地，现在又合起来了，其实，合了之后，改变的只是要素组合方式，而利益机制并没有发生变化。很多人只看到分和合，而没有看到背后的利益机制。当初的分，是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劳动的监督不容易，所以要分成一家一户的去作业。现在生产技术发展了，尤其是在平原地区，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把土地流转集中起来耕作，就成为可能，并且生产效率更高。土地合起来之后，经济利益关系仍然是很清楚的，并不是对大锅饭体制的回归。

土地权属关系的表达，也有一个变化。开始是分为集体所有权和农户的承包经营权。现在实行“三权分置”，也就是把最初的承包经营权，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

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我觉得有两个重大原因。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二是实行农业土地利用方向管控和资源保护的要求。在国外市场经济国家，土地通常是私有的，但是用途并不能随便改变，国家要进行管控。在我国农村，由于法治观念仍然比较薄弱，如果是私有制，用途管控会很困难，实行集体所有制，会有助于土地用途的管制。

承包经营权现在为什么分开了？在别的国家，土地通常只有一种属性——土地就是来种庄稼的。美国、日本和欧洲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不太一样，在这个用途之外，还有一个功能，这就是社会保障功能。因为，我国的农民还没有纳入到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尤其是40年前，30年前，农民没有养老保障，没有失业保障。现在，有2.8亿农民工到城里来就业，城里失业了，待不下去怎么办？那就要回去的，回到农村，靠着所承包的土地，可以维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至于造成贫民窟现象。我国没有出现贫民窟，与这种土地制度安排，有很大的关系。

土地的这两种属性，原来都捆绑在一块，体现在承包经营权中。但是，随着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就出现了矛盾。发展现代农业，尤其是平原地区，对土地流转、扩大规模的要求，很突出。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出于托底保障的需要，不愿意把承包经营权整个转让出去。现在，把承包经营权，拆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就是分别对应着两种职能。承包权属于村集体中的农民成员，承担着社会保障功能。承包权不准转让，不准抵押。农民在保留承包权的前提下，可以把经营权流转出去。经营权，就是土地的耕种权。经营权在流转了之后，具有承包权的农民，是可以重新索要回来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小，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保障感。土地的承包期，也不断延长。第一轮土地承包，从1983年前后开始，到1997年止，承包期为1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从1997年开始，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我觉得，这是很正确和很有智慧的。其实，说永久不变，老百姓的心里是没有数的，有不确定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永久不变。有明确的期限，反而更容易让农民具有稳定感。

第二，是市场制度改革，是放开市场。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农产品市场实行全面管控，实行的制度叫“统购统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只能卖给国家，叫统一收购；消费者能够购买什么，购买多少，也是由国家统一规定，实行粮票等票证制度，国家进行统一销售（配给）。实行这种制度的基本原因，

是短缺，是供不应求。开发市场的改革，是渐进性的，开始是禁止，后来是默许，最后正式放开。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分品种，有先后次序：先是瓜果蔬菜，然后是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然后是粮食，最后是棉花。在农产品开放市场方面，1993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真正全面取消了粮票。由于时间关系，这个过程就不详细讲了。

农产品市场的开放，是在整个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市场机制的地位，有一个长期的改革过程。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表述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2年党的十八大和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的地位和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1992年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和2017年党的十九大对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的表述，牢固地确立了市场经济在我国中的地位。实行好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文件、理念和实践三个层面的问题。写进文件，很不容易，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观念长期受计划经济熏陶，对市场机制充满了不信任，能够写入文件，是经过了艰难的过程，极为不易。写进文件之后，也并不意味着就真正进入了头脑，成为坚定信念。而要真正落实到实践中去，落实到各项具体的政策中去，更不容易。经常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况，写的是市场经济，讲的是市场经济，而制定出的具体政策和规定，却并不符合市场经济。根源，还是不相信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有效作用。

为什么要相信市场？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就是反映消费者的需求，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的需求，是通过价格表现出来的。如果一种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很旺盛，甚至不可或缺，那么，其价格一定高企。如果一种产品，价格下降得很厉害，那么，其需求一定不强烈。前几天我到海南，了解到一个情况：海南省种的橡胶，过去的几年中，价格连续下降，现在已经降低到原来的25%左右。农民每亩地大概只能收入1千块钱，除掉成本只有三五百块钱。如此低的价格和收益，农民是不愿意种的。但是，农民还必须种，因为，上级部门说，橡胶是战略物资，必须要保证。既然是重要战略物资，那价格应该高涨才对啊。既然价格连续降低，那就说明并不怎么重要，或者有很多的替代资源。我问为什么叫战略物资？难道橡胶比大豆和粮食还重要？缺了不行？没有人说得清楚。我猜想，可能是习惯的作用。以前的某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橡胶被作为战略物质，或者某个领导这样说过，就这么一直延续下来。外部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有关部门人员的观念还停留在以前。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一些人对待粮食问题的态度上。

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意义，更为突出。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资源条件不同，比较优势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每种产品，都能够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生产出来，就一定会形成产品的区域专业化生产。一方面，会形成大量的地理标志产品，另一方面，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以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例如，现在有很多地方，一个县就一品，全县

90%以上土地就种一种产品或两三种产品。例如，陕西洛川种的苹果，陕西眉县种的猕猴桃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计划经济思维下，以粮为纲，就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区域优势布局和优化的资源配置。现在很多地方形成的特色产品区域化现象，大的背景，也正是在这几年不特别强调以粮为纲了，各个地方都以各自最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来进行配置资源，所形成的。因此，文件到位很重要；但如果理念不到位，光有文件，实践也难到位。

这里还要提一下政府的作用。实际上，在上述的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中，如何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也日益明确清晰。政府的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让政府去做那些靠市场解决不了，或者解决不好的问题。我后边还要详细说这一点。

第三，税收与补贴政策。我国的农业税政策，历史久远。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 594 年，春秋时期鲁国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叫初税亩。它是承认土地私有合法化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1958 年出台的《农业税条例》，规定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 15.5%。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 90 年代末期，农业税费负担日益沉重，农民反映强烈。问题的主要根源，不仅仅是农业税本身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依附在农业税上的“三提五统”，即乡镇和村级提取的各种费用负担。这些负担，不透明，很混乱，难以控制。这时候，就开始研究农业税费改革问题，想搞出一个科学合理的农业税收政策。最后，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就根本找不到这样一种政策。任何一种农业税政策，都是不合理的；最合理的政策，就是取消。这是提出取消农业税的一个重要背景。不过，取消农业税，涉及到向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问题，因此，为了取消，需要先规范。最后，提出了农业税费改革方案：正税税率为 7%；农业税附加税为 1.4%。这相当于地租。2000 年试点，2003 年全面实行。2004 年开始降减，2006 年全面取消。我国的农业税制度，从初税亩算起，在实行了 2600 年后，终于寿终正寝。

提出实行直接补贴的背景是加入 WTO。当时，针对发达国家成员的补贴问题，上级领导交来任务，让我来牵头研究直接补贴问题。开始，我还有些不以为然，认为现在农业税还那么多，还没有取消，研究什么补贴？因为，补贴的作用恰好与税收相反，而原理是一样的：收农业税，就是因为你是农民，从事农业，就要向国家交税；而补贴，则是因为你是农民，从事农业，国家给你发钱。当然，我们还是做了认真的研究工作，并且提出了研究报告。在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建议：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取消教育费附加和“五统筹”；取消村提留；按照脱钩补贴方式，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等。研究报告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批示，明确要求研究适合国情的直接补贴做法，结合农村税费改革、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以及各项扶持农业的政策措施一并考虑，并指示财政部牵头做些酝酿。那时是 2001 年。从 2002 年开始，开始进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的试点。2004 年，全面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2006 年，实行农资综合补贴。补贴数额最大，远超其他补贴。2015 年，实行“三补合一”试点（把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三项补贴合并为一项）。2016 年，全面实行“三补合一”。在“三补合一”试点时，我们的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受财政部委托，进行了很好的调研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补贴，是直接补贴。此外，保护价政策，也是一种补贴，是通过扭曲市场实现的补贴。我国对小麦、稻谷，叫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玉米、棉花、大豆等，叫临时收储政策。其实，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可以统称为保护价政策，即：国家制定一个最低价格，当市场价格降低到这个价格时，国家按照这个价格，进行敞开收购。

我国的保护价政策，也是从2004年开始的。为什么是2004年？因为从1999年到2003年的5年期间，粮食连年减产。为了解决粮食减产问题，提高粮食生产水平，2004年把能用的手段全用上来了，包括减税、补贴、最低收购价格。2004年，开始对小麦、稻谷实行最低收购价格制度；2007年，开始对东北玉米实行临时收储政策；2008年，开始对大豆、油菜籽实行临时收储政策；2011年，开始对棉花实行临时收储政策。

在开始阶段，即2004-2007期间，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格保持不变，低于市场价格，因此，尽管有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但是并没有启动实际的收购。其后，2007-2014年间，保护价大幅提高。其中，每斤早籼稻从0.70元，提高到1.35元，涨幅93%；小麦从0.69元，提高到1.18元，涨幅71%；玉米从0.70元，提高到1.12元，涨幅60%。如此大幅度提价，使得保护价水平，不仅高于国内市场价格，也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结果，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国家库存爆满，财政补贴剧增，市场关系混乱：国内过剩时还大量进口，出现了销地价格低于产地价格等各种价格倒挂关系。

针对这些问题，又进行了改革。2014年，取消了新疆棉花、东北大豆的临时收储政策，而代之以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本来，当时有把目标价格政策也推广到其他品种上的想法，但是，在试行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时，尽管实现了价补分离、市场定价的积极效果，但也发现了诸多问题，包括操作困难、补贴额大增等问题。于是，就想别的办法：2016年，取消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改为实行面积补贴。此后，又尝试对稻谷和小麦的政策进行改革：保留最低收购价格制度，但降低价格水平。稻谷从2016年开始，每斤最低收购价格，早籼稻从1.33元降低到1.20元；中晚籼稻从1.38元降低到1.26元；粳稻从1.55元降低到1.30元。小麦从2018年开始，从1.18元，减到1.15元。

补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一方面，给农民补贴，肯定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补贴方式不当，就会变成政府花钱找麻烦。麻烦的根源，是不相信市场力量，干扰市场配置资源。国家可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总是有限的，应该采用最有效的财政支农办法，让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出最佳的作用。最好的补贴是不扭曲市场的补贴，最好的支持应当是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等。

第四，是就业制度方面的改革。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包括了乡（镇）办企业、村办企业、私人企业等，相当于农村的二、三产业。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农民从事非农业活动，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改革开放之后，极大地突破了这种限制。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到1987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就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为农村的就业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叫做“离土不离乡”。

第二个阶段，是离土也离乡，这就是农民工的发展。其定义是：户籍仍在农村，进入城市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其中，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叫本地农民工，现在已经超过1.1亿人；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叫外出农民工，已经超过1.7亿人。这在改革前乃至改革初期，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是对农民的就业市场的开放和收入渠道的开放，是城乡融合的肇始。

乡镇企业和农民工的发展，使得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持续增加。改革开放40年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平均年增长8%。这是史无前例的。现在农民家庭收入中，外出务工和农村非农产业收入，已经超过了一半还多。

农民工现在也还面临着各种问题。对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感受最强烈的，可能就是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现在的差异主要是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这些差异，是改革开放之前一直存在的，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了一些减弱减少。例如，农民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方面，以前是没有的，现在已经有了，但是水平仍然不高。未来的发展趋势，一直是城乡的融合发展，是这些差别的不断缩小乃至消除。

回顾40年，我国农业农村的改革，当然不仅仅限于以上四个方面，但这四个方面，是最重要的方面。

最后，简短归纳一下，讲点感悟。40年改革开放，翻天覆地，成就辉煌，关键就在于发挥了两个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的作用。40年改革的本质，就是不断的摒弃计划经济（包括制度和观念），不断走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赋予参加者有高度的自由选择权利。包括产业选择（种什么，养什么；怎么种，怎么养）、市场选择（卖给谁，卖什么价）、消费选择（买什么，买多少）、就业选择（哪个行业、哪个地方）等等。自由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努力和创新；选择的动力，是利益最大化。而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的最大化，就是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政府的作用。这也是绝不可少的，但是具体发挥哪些作用，却是需要界定的。四十年改革的过程，也就是政府不断放弃一些领域的作用，同时不断强化另一些领域的作用的过程。其实，这也可以归纳为放、管、服。放，就是改革，就是放开市场，尽可能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管，就是管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事，例如维护市场运行，遏制坑蒙拐骗，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质量安全……等等。服，就是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基础设施，科技，规划，信息，教育培训……等等。

在过去四十年中，两个作用的发挥，成就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展望未来，还要更加努力，在正确发挥好两个作用方面，深化改革，促进更快更好发展。对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如此，对于农业的发展更是如此。

（作者：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教授；2018年10月21日）

深切怀念最受尊敬的洪绂曾老学者

郭书田

洪绂曾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1932年生，江苏南京人，1949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后迁至沈阳农学院，于1953年毕业。开始任东北农科所助理研究员，后任吉林省农科院副研究员、研究员、副院长、院长。1989年至1997年任农业部副部长，九三学社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2012年4月8日在苏州市不幸逝世，享年80岁。

他在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期间，分管科技、教育、环保、能源、区划等工作。他积极推动农科教结合、产学研协作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农业基础研究与高新技术研究，取得重大发展。他努力推进农作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 and 转基因安全管理。他协调落实“丰收计划”，推广一批植物新品种。他视察了全国90%的高等农业院校与大部分中等专业学校，通过推行“绿色证书”发展农业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素质。他积极参加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与农村沼气建设。他推动利用高新技术监测农业资源动态变化，加强对农业资源管理与综合利用。

他在担任第六、七届中国农学会会长，第三、四、五届中国草原学会理事长与第六、七、八届中国草学会名誉会长期间，坚持不懈地为改良与建设草业呕心沥血。1979年，他带领团队投入聚合草研究，获得重大成果，受到嘉奖。1982年，他在加拿大访问期间，收集了上万种牧草品种资源材料，组织27个省市1100余名农业科技工作者参与《全国栽培牧羊草种区划研究》，获得嘉奖。他大力提倡立草为业、“小草大事业”，倡导组织全国牧草品种审定委员会，为牧草种子生产、国际贸易与国际交流奠定了基础。他积极促进国际的草业交流，与日本、加拿大等国建立了合作关系，获得了“2008年世界草地与草业大会”主办权，作为大会主席主持了会议。他倡导建立了“中国草业协会”，为推进苜蓿产业发展与奶业发展的结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在担任第九届人大常委农委副主任期间，负责起草《种子法》制定与《草原法》修订工作，参与《农业法》、《防沙治沙法》修订于制定工作。

他受聘于中国农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院校担任教授与博士生导师，指导了30多名研究生。他勤于著述，主编了《中国草原发展战略》、《中国草业史》、《中国多年生栽培草种区划》、《中国多年生草种栽培技术》、《中国牧草品种登记册》、《禾木牧草育种》、《青饲料轮作》、《苜蓿》等多部译著。

2008年至2009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出版《通讯》，设置了《林草兴邦和谐社会论坛》，他担任了“论坛”主任，对推动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通讯》上，他先后发表了《退牧还草还生态》、《加速草产业化发展》、《大力发展绿色苜蓿产业》、等专文。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发表了“我亲历祖国改革开放30年”；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发表了“60年感言”。

洪绂曾是德高望重的农业科学家，也是农业战线与民主党派中杰出的领导人。他毕生为公，忧国忧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保持和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始终保持了学者的本色。他以德传人，治学严谨，培养年轻人健康成长。他在科技界、农业界、民主党派内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大家的爱戴与怀念。他的崇高品德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大家永远学习的楷模。今年是他逝世7周年，恢复《林草兴邦与和谐社会论坛》作为纪念。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长、高级经济师）

境外农业产业的发展概况

朱丕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企业在农业境外与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在境外农业产业合作有了很大发展，并取得了良好效益和信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将有更广阔的合作前景。

1985年我国水产总公司首先走出去，到西非合作捕捞生产，以后很好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了农业走出去的步伐。在和平友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优势互补的原则下，广泛开展互利共赢合作，推进农业共同发展，繁荣市场经济。一些国有企业、地方与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利用境外农业资源和我国的资金、技术，采取租赁、独资、合资、补偿等各种形式，合作兴办各种农业产业，包括粮、油、棉、糖、菜果、饲料、养猪、禽、兔、奶牛、奶制品、油橄榄、油棕、橡胶、剑麻、葡萄酒、渔业等生产、加工、物流、还有良种，兽药、农机具等推广，有的还建立农业综合开发区、产加销储体系产业链。重点在亚洲、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也有欧、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些发达国家。

据商务部统计资料，我国农、牧、渔、林领域对外投资存量：2004年—2010年由8.3亿美元增加到26.12亿美元。2013年对外投资农业企业379家，投资存量37.13亿美元，遍及71个国家，解决东道国十多万人就业，并提供了税收。

近年来，国家重视发展境外农业产业，作为一项战略性措施。2013年农业部制定《2013—2020年境外农业资源合作开发的发展计划》，加强组织领导，支持中国机械美诺公司牵头，成立了中国农业境外农业开发产业联盟，鼓励推动企业强强联合，发挥各自优势，形成走出去的产业链。2014年国家进一步重视农业对外合作，成立了农业对外合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农业部牵头联合有关部委统一协调、给予政策，贷款的扶植与支持，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政府服务为保障，围绕保障农产品供给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在更大范围领域，更高层次上组织参与重点产业和区域的农业对外投资合作计划。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也相应地建立工作机制并拟定农业走出去的规划。2016年农业部又制定了《2016年—2020年农业对外合作

规划》，还成立了海外农业研究中心、有关信息服务平台、为走出去农业企业培训人才和项目信息与评价等工作体系，确保境外农业产业健康发展。据商务部统计资料，农、牧、渔、林业对外投资存量 2012 年为 49.64 亿美元，2016 年为 148.85 亿美元，遍及 105 个国家与地区，有 1300 多家企业。另有报导，2016 年底我国在 100 多个国家与地区，农业对外投资 500 多个项目，投资存量累计 1800 多亿元人民币，统计难以备全。

我们应当看到：当今全球仍有 8 亿多人缺粮与营养不良，急待增加农产品生产和供应，任务艰巨。我国农业尽管有了很大发展，但人民生活改善，对农产品需求不断增加。人多，耕地少，水资源紧缺，（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1/3，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1/4）。近年来进口粮豆、油、棉、糖等农产品，据专家估计，相当于 8 亿到 10 亿亩播种面积的产业。因此，积极发展境外农业产业，对振兴我国农业和世界农业都有重大意义，具有广阔前景，大有可为。

一、已有一批骨干，境外农业企业，正在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水产集团公司 2016 年底拥有 2571 艘渔船，作业海域 40 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公海及南极海域，公海渔业产量占 65%以上。中国农垦集团公司在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 117 个项目，累计投资 330 亿元人民币，境外产值达 460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达 15 亿元人民币。

中粮集团公司对外合作覆盖 60 个国家和地区，业务涉及 140 多个国家与地区。2014 年曾收购荷兰农产品公司尼德拉和香港来宝集团下的来宝农业公司，拥有强大的粮食采购能力。经营量达 1 亿吨，经营收入 50% 来自海外，海外企业员工超过 2 万人。预计到 2020 海外营业收入将占 60%以上，海外粮源掌控量超过 5000 万吨，第三国贸易量超过 8000 万吨，总经营量达 2 亿吨，成为国家粮食进出口战略的国家队。上海光明集团在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以色列、法国、意大利均有合作，生产乳品、葡萄酒、橄榄油等食品。海外企业营业总收入 226 亿元人民币，海外企业资产总额达 329 亿元人民币，海外员工超过 1.2 万人。中国化工集团 2015 年收购倍耐力集团农业跨国公司（70 亿欧元），2016 年收购瑞士先正达公司（430 亿美元），2016 年还收购克劳斯马赛公司（10 亿美元）。上海鹏欣集团在新西兰、巴西建立奶业和粮食生产基地。湖南袁隆平高科技公司 2015 年投资 1 亿元人民币，成立国际种业公司，向亚、非、拉地区开辟推广杂交稻种子国际市场。陕西杨凌投资贸易服务中心在哈萨克斯坦等 6 个海外农业示范园区，推广农业对外投资与中国农业技术装备，有利加快农业对外开放步伐，增强企业国际竞争能力。

二、走出去办农业已遍及全球五大洲

1、亚洲是首选开发地区。

广东农垦集团公司 2005 年起就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老挝、缅甸、新加坡等国家建立 40 多个天然橡胶产业项目，打造了集科研、种苗繁育基地、加工、仓储、物流，贸易于一体的产业链。2016 年成功收购全球第三大天然橡胶企业的泰国泰华橡胶公司，年加工能力达 150 万吨，种植 200 万亩橡胶树，有 1 万多个当地职工。云南农垦集团公司 2006 年在老挝成立云橡投资公司，2011 年在老挝北部 4 省 9 县建立 16 个香蕉基地，种植橡胶 6.92 万亩，苗圃 1063 亩，带动当地农民种植橡胶 11 万亩，建成万吨橡胶制品加工厂，累计投资 1.28 亿元人民币；另外在缅甸开展禁毒替代种植企业，种植橡胶 9.2 万亩，甘蔗 3 万多亩。广西农垦在越南，缅甸推广中国玉米杂交种；在越南、印尼、菲律宾合作生产剑麻、甘蔗、木薯；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合建示范农场，在老挝合建蔬菜农场。广西格霖农业科技公司在越南广宁、凉山两省建立马铃薯基地 3000 亩。广东省淡水鱼各优鱼类、种苗繁育中心在菲律宾民都洛岛合作开发 1000 公顷罗非鱼、宝石斑鱼、对

虾养殖，年产罗非鱼 1.5 万吨，宝石斑鱼 1500 吨，对虾 1600 吨。天津聚龙集团在印尼建立农业综合开发区种植油棕与加工为主，已建 2 万公顷，计划在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分别建油棕产业园，扩大到 20 万公顷，年产棕榈油 100 万吨。2010 年湖北种子公司在巴基斯坦推广水稻杂交种 40 万公顷。中国种子公司与巴基斯坦佳德农业公司，白沙瓦农业大学合作，在巴基斯坦推广中国杂交小麦，比当地品种可增产 20% 以上。河南省经研银海种业公司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奥什州、贾拉拉巴德州合作推广棉花、玉米良种；在哈萨克斯坦合作推广良种和温室大棚建设；在坦吉斯坦推广棉花、蔬菜、水稻良种。西安市爱菊粮油工业集团在哈萨克斯坦合作建立小麦生产基地。

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潜力很大。吉林省在俄罗斯滨海地区投资 2 亿美元，建设产加销服务一体化的农牧业产业园区。黑龙江省也在滨海边疆区合建现代农业经济合作区，2012 年起开垦 20 万公顷，5 年内投资 13.5 亿元人民币，分设 14 个小区，辐射 68 万公顷。2012 年 7 月牡丹江市东宁华信集团公司和农垦局与俄罗斯阿尔玛达公司合作，在俄滨海边疆区波波夫卡共建新友谊农场，开发土地 340 万亩，办农业企业 23 家，综合农场 5 个，家庭农场 400 多个。2013 年中实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合作，投资 1 亿美元，在那里建立肉兔生产企业。

2、非洲是重点开发地区。

2017 年底统计，中国在非洲农、牧、渔、林企业 108 家，投资 500 万人民币以上项目 117 个，遍及 35 个国家（占非洲 2/3 的国家），投资存量 148.3 亿元人民币。中国农垦集团 2011 年在东南非、中南非、北非等地建有 15-20 个农场，10 个农产品加工厂，10 个农业站技术服务贸易网点。2008 年在刚果（金）种植大面积油棕。中国水产集团在非洲 13 个国家，有 23 个渔业合作项目，拥有渔船 450 艘，劳务人员上万人，年产鱼 40 多万吨。中国农业发展集团在赞比亚、坦桑尼亚、几内亚、加蓬、加纳等国开垦 1.6 万公顷土地。中信集团联合新疆兵团、中国工程国际公司、黑龙江农垦，利用安哥拉政府石油抵押贷款，实施大型粮食生产加工仓储项目，投资 3.6 亿美元，开发 3 万公顷以上土地。2010 年安徽农垦集团与津巴布韦合作将开发 50 万公顷土地。湖北万宝粮油公司在莫桑比克合作办友谊农场，投资 2.89 亿美元，种粮 30 万亩，带动周边农民 100 万亩粮田。青岛瑞昌棉业公司在赞比亚、马拉维、津巴布韦、莫桑比克进行公司加农户合作开发，获得中国非洲基金和国家开发银行 8000 万美元融资。山东外经集团联合鲁棉集团在苏丹拉赫德汉区，合作开发 10 万亩土地种植棉花，并建年产 2 万吨皮棉加工厂，投资 6000 万美元，今后还将推广到 100 万亩从事棉花产业化联合企业。中非农业投资公司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建立剑麻农场，2009 年生产剑麻 2000 多吨，效益良好。中国企业在几内亚办的世纪高大农场，在赞比亚办的中垦农场，在喀麦隆办的雄狮特业公司和兴和农业投资公司，发展蛋鸡和肉鸡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如在赞比亚的中国企业生产的鸡蛋已占当地市场销售量的 40%。2012 年山东安丘绿洲兔业公司在加纳建立年产 1000 万只种兔，繁育养殖加工企业，带动当地 5000 农业就业。河北保定农民 1.5 万多人，在非洲 27 个国家建立 28 个保定村，以农业开发为先导，加工、贸易共同发展，经营土地达 40 多万公顷。中地海外集团绿色西非农业公司 10 多年来在尼日利亚办瓦拉农场，培育水稻良种“伽瓦 1 号”品种，比当地品种增产 30%，在西非进行推广。河北省张家口农科院 2008 年起在埃及、乌干达、马里等 8 个国家试种杂交谷子，耐旱高产，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推广的耐旱高产作物，将得到广泛推广，造福非洲人民。

3、欧洲以农产品加工为主，东欧发展粮畜生产。

北京、上海、香港商界在法国收购波尔多酒庄葡萄酒生产企业，向中国销售葡萄酒。阿里巴巴的总裁马

云 2015 年以 950 万英镑也收购了法国波尔多地区的古尼和佩雷两个酒庄。山东张裕葡萄酒集团收购了法国卡斯特集团的密合花酒庄 90% 的股权（333 万欧元）。安徽鸿汇食品公司在罗马尼亚合作开展养蜂和蜂产品加工企业。2012 年重庆黄金水岸发展公司与摩尔多民葡萄酒公司合作，开办葡萄酒生产企业。2014 年中国圣元国际集团在法国布列塔尼地区投资 1 亿欧元合建婴儿奶粉加工厂。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投资 800 万欧元，收购荷兰贝尔亨现代农场，有 6 万平方米高端智能蔬菜温室，4 万平方米未育种研发基地。光明集团 2014 年 10 月以 1 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萨洛夫橄榄油集团的 90% 的股权，从来橄榄油生产加工销售企业。安徽怀远石榴酒公司与马其顿戴维娜酒庄合作，在那里开发石榴庄酒与葡萄酒生产企业。天津农垦集团公司在保加利亚投资 1000 万欧元，租赁 3 万亩土地种玉米、苜蓿等饲料，运回天津发展畜牧业。

乌克兰有丰富土地资源，租金低廉。基辅地区每公顷水浇地年租金只 50 美元，或以产品 20% 作为租金补偿。黑龙江北大荒种业公司，在乌克兰租地，开发 15 万亩。河南省黄泛区实业公司、泛达农业公司 2013 年在乌克兰成立合资企业，投资 1000 万美元，租 6000 多公顷土地，从事奶牛、肉牛等生产。辽宁乐丰牧业公司在乌克兰，与农业联合体合作建设 20 万吨饲料厂。辽宁投资集团的益康生物公司与乌克兰阿尔泰生物技术公司合作，在那里生产动物疫苗和兽药生产。

4、在美洲以拉美地区合作为主，与美国也有合作。

2011 年鞍山市嘉鲜农业发展公司与美国阿波罗公司合作，在密西西北河捕捞鲤鱼，加工成品，年产 40 万吨鱼品，投资 2 亿美元，雇佣 1600 渔工，拥有 800 多条渔船，30 个加工厂。2013 年双汇国际公司以 47 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该公司在美国有 460 座养猪场。北京德青源公司与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合建沼气示范工程，年产沼气 350 万立方米，年发电 700 万千瓦，年排 CO₂ 4.2 万吨，开展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合作，今后还将扩大建设。黑龙江省在美国加州合作成立天源豆业公司，开发中草药和大豆卵磷脂胶囊生产。

拉美、巴西、阿根廷等国土地资源较多。中粮集团、黑龙江、广西、重庆、山东、上海、新疆等一些企业分别在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开展种植业投资合作。2014 年中粮集团公司在巴西已建 2 个码头、12 座筒仓、1 个转运站、4 个糖厂、2 家大豆榨油厂，投资存量将达 50 亿美元。黑龙江九三粮油集团在巴西，开建油棕生产基地。山东冠来集团在巴西建立大豆和油棕基地 3 万多公顷。浙江海宁华来村农民朱张金 2009 年带队去巴西，成立合作社种植粮豆 3 万亩，今后计划扩大到 20 万亩。中国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公司在多来尼克合作发展蔬菜大棚生产，使当地蔬菜供应充足，而且价廉质优，居民满意。

5、在大西洋以畜牧业为主。

2012 年上海鹏欣集团公司投资 10 亿元人民币，收购新西兰 16 个奶牛场。2014 年伊利集团太平洋奶业在新西兰投资 30 亿元人民币，开办奶品深加工生产线大企业。2015 年蒙牛集团与雅士利公司合资 11 亿元人民币在新西兰新建奶粉加工厂。上海光明集团收购澳大利亚玛纳森食品公司（畜产品）75% 股权，还收购新西兰新莱特奶业公司 51% 的股权。中国企业以 2.35 亿美元收购了澳大利亚丘比公司，从事棉花生产。中国月亮湖投资公司 2016 年 3 月以 2.2 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培斯马尼亚岛的牛奶，空运专销浙江宁波市。2017 年辛希望集团公司投资 10 亿澳元，收购了澳大利亚的真诚爱宠公司（生产供应宠物食品企业）。

（作者：原农业部国际合作司长；2019 年 1 月收集报刊资料综合管理整理）

贵州农村产业革命的启示

朱启臻

乡村振兴的基本条件是具有产业支持，只有产业兴旺才能给乡村增收入、聚人气、建设美丽家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要标志。但是，乡村传统产业不能满足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难以支撑乡村的发展，成为乡村衰败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振兴乡村产业是乡村振兴最迫切的任务，也是乡村振兴的难点。贵州围绕乡村产业大文章，提出要在全省范围内“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产业革命”，要“采取超常规、革命性的手段”，可谓是抓住了重点，突破了难点，为乡村振兴找到了有效路径。

乡村产业革命不仅要依托技术进步来推动，更需要围绕调结构、转方式和组织创新等方面来实现，这是贵州乡村产业革命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一、产业结构调整

第一，乡村产业振兴要坚持多业并举，走乡村经济多元化的道路。乡村经济多元化既包括乡村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也包括产业内容的多元化。多样化的种植、多样化的养殖；丰富多彩的乡村手工业；既有大田的农业生产，也有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的庭院经济和地方特色的手工业；更要发展乡村休闲度假体验等新型服务业。贵州特殊的气候与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珍稀特有资源，为多样化产业类型创造了条件。乡村经济多元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好处：首先是多样化农业满足农民多样化的需求，是农民重要的“福利”体现。其次，乡村经济多元化有利于分散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其三，乡村经济多元化有利于充分利用乡村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以及乡村空间资源和人力资源。

第二，乡村的产业兴旺要发展特色产业和融合产业。特色农业是指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凭借独特资源条件所形成的具有独特产品品质以及特定消费市场的特殊农业类型。特色农业是天时地利人和在农业生产上的具体反映。贵州 92.5%的山地，自然环境优越，要突出其地域、物种和气候优势，绿水青山可以通过发展特色中药材、食用菌、茶叶、特色蔬菜等有机、绿色农产品实现向金山银山的转变。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丰富的珍、野、稀、名、特物种资源，是发展特色农业的资源“宝库”。除了特色农业，产业革命还必须坚持走融合发展的产业道路。融合产业一方面指产业链的延伸，另一方面指农业和乡村功能的扩展。发展特色和融合产业，当地科研力量可以发挥独特作用。黔西南喀斯特研究院在为农民“选择好产业，当好好参谋”方面做出了表率。在义龙试验区的 7 个乡镇实施“稻鱼共生”生态立体农业项目，分发挥水稻、食用菌、薏仁米、中药材、经果林、信息化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帮助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成为乡村产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和引导作用。

二、转变生产方式

乡村产业革命，迫切需要从传统生产方式转变为现代生产方式。在农业发展方式上，切忌把工业思维模式生搬硬套到农业上，要准确理解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农民变股东等实现的条件和形式。农业生产方式无论如何创新，都要特别注意遵循以下三个规律：

第一，家庭经营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形式。这是由农业特点和家庭特点所共同决定的。农业的家庭经营是土地产出效率最高、风险最小、成本最低的农业经营方式，只要农业生产特点不变，农业经营的家庭方式就不会发生变化。任何否定农户经营的基本制度，要土地而排斥农民的做法违背农业发展特点。

第二，家庭农场是未来现代农业的基本单位。解决农户生产的问题不是以否定家庭经营为代价。应该看到，乡村人口城镇化为乡村规模农业提供了条件，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把已经脱离耕地家庭的承包地流转给种地的农民，让他们种更多的地，培育出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作为中国现代农业的基本经营单位。

第三，合作社是农业生产者的理想组织形式。通过合作社把农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联合起来，与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一起，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这样才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维护农民的利益。合作社发展，在微观上要培育家庭农场，激发农民的内在合作需求。在宏观上通过联合社解决合作社规模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可以说，为乡村的产业振兴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路径。

（作者：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乡村旅游发展的若干对策建议

于法稳 杨 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我国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设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休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小镇。《乡村振兴战略2018-2022》提出，顺应城乡居民消费拓展升级趋势，结合各地资源禀赋，深入发掘农业农村的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以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增加乡村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由此可见，乡村旅游是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内容，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基层调研发现，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先天不足”“运行不当”“保障不力”问题，成为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发展质量，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障碍性因素。为此，需要采取有效对策，促进乡村旅游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以助力乡村振兴。

一、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乡村旅游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内容。国家政策的出台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战略机遇，乡村旅游将进入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期，但必须清晰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 “先天不足”。一是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可行性缺乏科学认识。当前，优美的生态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最重要的资源基础与前提条件，但并不是说具备了发展乡村旅游的所有条件。基层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盲目追逐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上”现象相当普遍。二是缺乏乡村旅游发展的科学规划。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中，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发展规模、市场前景、保障措施以及谁来发展、发展什么、如何发展等问题都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更没有形成科学规划，完全依据基层政府主要领导的主观判断，具有极大的盲目性。三是对乡村旅游发展的资源承载能力缺乏科学分析。调研发现，当前乡村旅游发展多采用外延式的方式，盲目扩大发展规模，根本没有考虑到区域生态承载能力，更缺乏科学的分析与评价，从而导致区域资源破坏及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2. “运行不当”。一是过多地引进现代元素符号。调研发现，乡村旅游发展中多采取传统旅游业的理念与方式，把重点放在了基础设施的大建设、铺大摊子、上大项目方面，过多地把现代元素符号引进乡村旅游发展之中，而淡化真正能够体现乡村旅游特点的区域文化元素符号、民俗民风元素符号，而这些才是发展乡村旅游的灵魂所在。二是过多地引入城市元素符号。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是让旅游者感觉到置身于乡村优美生态环境之中，可以呼吸清新而洁净的空气、喝到甘甜而洁净的饮水、吃到安全优质的农产品、体验到乡村农耕文明以及民族文化风俗、领略到乡村地域的民居特点等，但调研发现，乡村旅游发展中过多地把城市元素符号引进来，让旅游者感觉不到乡村之美、乡村之幽、乡村之香。三是乡村旅游商品缺乏区域性、安全性、艺术性。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商品区域性特点不足，缺乏依据区域资源优势开发的商品；同时，乡村旅游景点所销售的商品，多数是来路不明的产品，缺乏基本的安全性；特别是，乡村旅游产品的设计更缺乏艺术性，难以满足游客多层次多样化与高文化品位的需求。

3. “保障不力”。一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人才严重短缺。当前，我国从事乡村旅游的主体，是广大的农村居民或者一些企业主，严重缺乏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队伍，前者对乡村旅游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局限，也缺乏有效的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发展。二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管理组织不健全。调研发现，很多地方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管理组织，导致了乡村旅游的无序发展，而且难以对乡村旅游经营主体进行监管，进而影响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三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管理机制与体制缺失。每一种产业的健康发展都需要一套完整的适应其特点的管理机制与体制，但以往由于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没有真正重视，其管理机制与体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无法保障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

二、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对策建议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针对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应采取有效对策，以更好地推动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1. 重视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期准备工作。一是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对于特定区域而言，是否适宜发展乡村旅游，首先要分析是否具备资源基础，还要分析其地理区位、交通条件等要素，以及农村人居环境状况，综合分析评价之后再做出判断，切不可盲从于全域旅游理念，不切实际地发展乡村旅游。二是对乡村旅游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在对乡村旅游发展资源状况、特点及其空间分布、农村居民意愿等进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科学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发展重点、发展规模以及所需要的保障措施等。三是对乡村旅游资源的生态承载力进行科学评价。对规划发展乡村旅游的每一个区域进行生态承载能力的评价，分析该区域适宜的游客规模、游客来源，以及对区域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等，并提出相应的预警方案。四是对乡村旅游发展主体进行培训。根据规划，对从事乡村旅游的主体以及管理组织成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对乡村旅游的认知水平，以及如何做好乡村旅游服务等基本要求，以提升乡村旅游发展的质量。

2. 依据乡村旅游特点强化运营管理。一是强化绿色理念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指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切实保护乡村旅游资源基础，强化农村生态系统、农业生产系统以及农村人居环境系统的保护、改善与治理，提升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二是强化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在发展载体方面，积极推动采摘园、农家乐、民宿游等传统乡村旅游产品提质升级，与此同时，推动度假乡村、现代农业庄园等新业态新产品，着力提升乡村旅游吸引力，拓展产业链条，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三是着重开发区域性乡村旅游商品。依据区域农村资源优势，开发区域性强的旅游商品，保障商品的安全性，提高商品的艺术性，以满足消费者对区域性乡村旅游商品的需求。四是充分挖掘区域生态、民族文化、民俗等元素的价值，避免一些误区。乡村旅游要注重发挥区域特色，挖掘关键元素的价值，提升对游客的吸引力，避免过多地引进现代元素符号、城市元素符号。

3. 强化乡村旅游发展的保障体系建设。一是注重乡村旅游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区域每个乡村旅游景点的功能定位、发展前景等，制定相应的培养对策，造就一批专业队伍，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旅游发展。二是健全乡村旅游的管理组织。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需要一个有效的组织，以规范、监督乡村旅游发展主体的行为，并进行必要的评价，更好地推动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因此，在基层应健全乡村旅游的管理组织，并注重农村居民的广泛参与。三是建立与完善乡村旅游发展的机制。创新乡村旅游发展的机制体制，明确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及时出台促进乡村旅游的相关政策，增加这些政策的精准性及有效性，引领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四是制定乡村旅游的标准。新时代乡村旅游将实现跨越式发展，迫切需要制定相应的标准，以促使乡村旅游发展规范化、标准化。五是强化乡村旅游发展的立法工作。围绕着乡村旅游发展，加强立法，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逐步将乡村旅游纳入法制化轨道，更好地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作者：于法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 果，重庆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乡村振兴应该“人出来，钱进去”

陆 铭 周 静

又一个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出现了“萎缩”。最新发布的《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8）》显示，2017年北京市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实现双降——常住人口2170.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2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794.3万人，与去年末相比减少13.2万人；户籍人口1359.2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万人，降幅3%。

故事的另一面是农民工进城放缓甚至回流的趋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针对500个村的监测数据显示，去年一季度农民工外出数量下降了2.1%。尽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全国外出农民工达到1.72亿人，同比增长1.5%，逆转了连续六年增速下滑的趋势，但在城市公共服务存在歧视和乡村振兴战略提倡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未来城乡人口流动的趋势究竟会如何演变？中国城市化进程又将走向何方？乡村到底该依靠什么振兴？

近日，界面新闻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教授。他长期研究劳动经济学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著有《大国大城》和《空间的力量》等多部专著以及音频课程《中国经济72讲》。陆铭认为，全世界的趋势都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同步提高，人口逐步向大城市集中，并且大城市人口向中心城区集中，政策制定者需要尊重人性和经济规律。他还表示，打通城乡资源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未来乡村振兴的道路应该是人出来、钱进去。

界面新闻：对于北京市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双降的现象，您如何评价？北京大城市化的趋势是否走到了尽头？

陆 铭：这个数据是政策控制的结果，不能反映实际趋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率不断提高是世界普遍的规律。人口不断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存在，而且在那些城市化率已经达到80%、90%的发达国家仍然存在。世界上应对城市人口增长的普遍做法是从供给方入手，增加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包括造更多的房子来使得大城市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而不是通过行政措施控制人口增长，甚至驱赶外来人口。

界面新闻：回首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市和区域发展进程，您认为中国在哪些地方做的比较好？哪些地方需要加强？

陆 铭：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做得最好的地方是：通过融入全球化和快速的城市化，把国内劳动力的生产率解放出来，并且跟全球资本进行结合，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增长动力。而需要加强的地方在于：在生产要素的配置方面，应该让人口流动更加自由，让土地配置更加顺应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人口流动的方向，把资本配置到有更高回报的地方，而不是配置到没有回报的地方。

事实上，城市和区域发展有三大规律：第一，城市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第二，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第三，在特大城市，人口重新返回到市中心。对照来看，我们的政策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比如，现在的政策还有太多阻碍农民进城的地方。城市里面存在对于农民长期以来的公共服务歧视，包括其子女受教育的问题，甚至出现了一些做法，想通过鼓励农民回到农村来解决农民的问题。这个方向跟城市化发展趋势不一致。

此外，全世界的趋势都是顺应大城市发展，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而我们现在的政策导向是去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这个方面也要改进。

而且，大城市内部人口向中心城区集中，这跟产业结构变化有关，因为服务业比重提高了以后，大量工作岗位是集中在市中心的，同时，大城市的市中心提供了更好更多样的服务消费，所以发达国家那些大城市人口重新回到市中心。但我们现在的大城市是在控制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疏散人口，这跟这些城市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不吻合。

政策制定者需要尊重人性和经济规律，而不是用自己的想象去为人民定义一个美好生活。比如，乡村振兴是通过农民更多的进城来振兴，还是把农民留在农村来振兴？如果中国通过把农民留在农村来实现乡村振兴，不符合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农民进城实现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农民的收入受制于土地面积也难以提高，同时农场的规模也没法大型化，农业生产的成本难以降低，影响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界面新闻：有观点认为，农民若是集聚在大城市，大城市无法负担足够的公共服务，而且以农民的收入水平在大城市并不能有很好的物质生活，您怎么看？

陆 铭：第一，在世界范围之内，对于进城的低收入者之所以要强调公共服务，意味着他们在某些方面的生活支出不是由个人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政府的公共服务决定的。比如说政府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政策，是要倾向于低收入者的。换句话说，这些支出不是跟他的收入挂钩，而是跟政府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到什么程度挂钩。第二，当你看到大量的农民，在政府不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放弃在农村的大房子，住在城市的小房子里，你觉得哪一个生活对他们来说更美好？如果城市比老家的生活更好，而我们又觉得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还不够好，那么，政府是不是应该给他们提供廉租房、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帮他们留在城市？在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就是通过公共政策帮助农民进城来促进城市化的。

界面新闻：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大量儿童无法随父母进城，而成为留守儿童，不仅产生安全问题和心理问题，还让他们同城市儿童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受教育水平差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陆 铭：唯一的办法让他们尽早随父母进城。如果父母选择回到乡村陪伴孩子成长，父母的收入增长怎么解决？孩子未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怎么解决？而在城市这边，农民越回去，劳动力越短缺，同时城市必须要把更多的财政收入转移支付给农村去扶贫，反过来城市的负担会更重，结果是城乡两头都受负面影响。所以应该让孩子跟随父母进城，而不是相反。

从城市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趋势来看，农村的孩子将来必定进城。如果未来必须要进城，那早点进城好，可以跟父母团聚，教育也可以更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农村的孩子越早进城，就越能适应城市生活。而未来的城市更多需要的是服务业的人员，更需要从业者具有城市生活的经验，所以考虑到这样的发展方向，留守儿童当然越早进城越好。

界面新闻：那么政府应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承担什么职能？

陆 铭：大体有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的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

那么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在人口流入地提供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的需求，而在人口流出地可以建设基础设施，发展当地有比较优势的农业、旅游，比如说建小机场促进边远地区的旅游业，建养老院和医院，为留下来的人口提供服务。第二种状态是完全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不管，如果政府不提供教育，那就民间资金办学校，如果政府不提供廉租房，那低收入者在城市更多地住城中村和地下室。第三种状态是政府不让农民在城市居住，让他们回到农村。农村本来适合发展的产业是旅游和农业，但政府却违背规律地发展制造业，来安置回乡农民。这三种状态中，第一种最优，第二种次之，最后一种最差。

界面新闻：我们看到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提供的公共租赁房和廉租房很多都在比较偏远的郊区。这科学吗？

陆 铭：这个政策有问题。如果城市在制造业发展阶段，政府想解决住房问题和想省钱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因为制造业的岗位是在郊区，郊区的住房成本也比较低。但在今天的大城市，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就会出现政府想省钱的逻辑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解决住房问题之间的矛盾。如果大量服务业岗位集中在市中心，而提供的公共租赁用房和廉租房在郊区，就会导致两个现象：第一，有些人宁愿放弃公租房，住在市中心，自己租房子住。中国有些大城市已经出现这个情况了，结果把享受廉租房的收入标准不断提高，因为低收入者不去住；第二就是一部分低收入者住到远郊的廉租房去了，要么长途通勤，要么因为工作太远，宁愿选择失业。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第一，政府放弃掉省钱的思维，把城市的宜居程度和缓解交通压力目标纳入进来，适当把公共住房布局在中心城区，比如45分钟到一小时通勤距离范围之内；第二就是货币化，给钱或住房券，由租户自己选择居住地。

界面新闻：现在也有一些城市人想去农村生活，如何打通城乡资源，不仅让农村人更容易进城，也让城市人更容易进村？

陆 铭：打通城乡资源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未来乡村振兴的道路应该是人出来、钱进去。农村人进城，可以提高剩余农村居民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城里的人才和钱进去，去开发跟农村相关的适宜发展的产业，比如说有些有钱阶层可以去农村养老（如果有人愿意），或者去经营民宿、旅游。现在非常大的障碍是农村的宅基地不可以买卖，这个一定要突破。一部分农民想进城，如果他的宅基地可以卖出一个价格，可以给农民带来一笔财产性收入。如果农民不希望进城，当资本下乡发展起一些新的产业，农民也可以在农村从事新的职业，比如说在民宿里做服务员。

如果在买卖方面不能突破的话，应该至少允许宅基地长租，稳定的租给城里人，比如说二十年、三十年，那么承租人可以进行长期投资。这样，农村的风貌也可以有一个大的改变，相应的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的投资。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过程要充分保护农民的产权。如果农民不愿意把自己的宅基地出卖或者说转租，那要保护他们的权益。整个过程要建立在两厢情愿和公平交易的基础之上，农民进城的过程也是建立在农民自愿、在城市里有就业和相应的社会保障的基础上，而不是强行来改变农村的现状。关键要解放思想，依靠农民进城和资本下乡来改变农村的面貌是世界上的普遍经验，不能希望把现有的农民留在农村去改变农村的面貌。

（作者：陆 铭，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周 静，本文采访人，供职于界面新闻；本文刊于界面新闻2018年12月13日）

德国乡村振兴的主要做法及启示

叶兴庆 程郁 于晓华

摘要：德国城市化起步较早，在其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乡村地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较大差异，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在不断调整完善。在城市化率接近和超过 70% 以后，德国应对乡村衰落的主要做法是，以产业的“逆城市化”增加乡村就业机会，以“村庄更新”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提升乡村生活品质，以欧盟“引领项目”（LEADER 项目）促进乡村地区综合发展，以创新发展推动乡村“再振兴”。德国的经验表明，均衡的城市化和生产力布局更有利于城乡互动、促进乡村地区发展，土地整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和切入点，不同发展阶段乡村衰落的内在逻辑不同、促进乡村振兴的策略也必须相应调整，促进乡村振兴有必要营造社会氛围、集聚人气。

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应对乡村发展危机、促进乡村繁荣发展，是大多数国家曾经或将要面对的一道难题。德国城市化起步较早，在其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乡村地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较大差异，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在不断调整完善。从德国应对乡村发展危机的主要做法中^①，可以为我国如何找准切入点、有效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一些启示。

一、德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衰落问题

德国早在 1850-1855 年间城市化率就超过 30%、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在 1890-1895 年间城市化率超过 50%、进入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在 1955-1960 年间城市化率超过 70%、进入后城市化时期。由于 1871 年统一之前德国大小城邦林立、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加之后来国家空间规划和区域政策有意识地引导工业企业向小城市和镇布局，从而使德国城市化呈现出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城市的分布和规模结构非常均衡，以小城市和镇为非农人口的主要承载空间。目前德国人口规模为 8200 万人，有大小城市 2000 多个，其中，生活在 10 万人以上城市的仅占全国人口的 31.7%，生活在 2000 人以下村庄的约占全国人口的 8.5%，其他 60.6% 的人口生活在 2000 至 10 万人的小城市和镇。大部分城市和镇以都市圈的形式联结在一起，既在空间上分散布局，又在经济上紧密相连。例如，德国第九大城市杜塞尔多夫市区人口只有 57 万人，但以其为龙头的 500 公里半径范围内却聚集着 1150 万人口。这种城市化格局，有利于促进城乡互动、带动乡村地区发展。

尽管如此，德国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后同样面临乡村发展危机问题。在城市化率 30% 至 50% 的发展阶段，也就是 19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末，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大片土地出现荒废，乡村景观和生态环境遭受工业化城市化的破坏。在城市化率 50% 至 70% 的发展阶段，也就是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60 年代，人口和就业向城市的集中导致乡村人口进一步减少，乡村“空心化”更加严重，村庄衰落趋势更加明显。在城市化率超过 70% 以后，也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无计划的“返乡运动”，导致农村地区建筑密度增大、交通拥挤

杂乱、土地开发过度、土地使用矛盾加剧，工业化思维的建设改造破坏了农村原有的村落形态和自然风貌。新世纪以来，由于人口老龄化以及乡村公共服务的规模不经济，美丽乡村仍然难以避免人口衰减、经济活力下降的问题，德国面临人口“再城市化”、乡村“再振兴”的新挑战。

二、德国促进乡村振兴的主要做法

在不同发展阶段，德国应对乡村发展危机的做法有较大差异。在城市化率 30%至 50%的发展阶段，主要是通过建立移民委员会，建设农村居民生活点，增加中小农户的数量；通过发起“家乡保护”运动，保护乡村自然景观。在城市化率 50%至 70%的发展阶段，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深刻危机，一战后促进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开展移民垦殖和定居点建设、以安置战败后因割让领土而失去家园的难民，二战后促进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举措是通过项目建设以创造就业机会、通过一揽子的农业支持政策以增加农民收入。在城市化率接近和超过 70%以后，应对乡村衰落的做法更加全面系统，以下进行重点介绍。

（一）以产业的“逆城市化”增加乡村就业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规模重建使城市成为经济和生活的中心，加之农业机械化使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乡村人口大量减少，缺乏生机活力。针对这种情况，1954 年和 1955 年原联邦德国先后颁布《土地整治法》和《农业法》，推动小规模农户退出后的土地流转集中、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推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高乡村生活水平。通过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和功能布局规划，强化小城市和镇的产业配套与服务功能，增强其对大企业的吸引力，让在小城市和镇工作、回乡村居住成为理想的工作生活方式，形成了产业和人口的“逆城市化”发展趋势。德国排名前 100 名的大企业，只有 3 个将总部放在首都柏林，很多大企业的总部设在小镇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乡村的现代化，促进了城乡的均衡协调发展。

巴伐利亚州在促进大企业向小城市和镇布局、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效更为明显。1965 年原联邦德国颁布《联邦德国空间规划》后，该州遵循“城乡等值化”理念制定了《城乡空间发展规划》，按照城乡居民具有相同的生活、工作、交通、公共服务等条件的目标规范建设活动。乡村条件的改善，加之土地和税收优惠政策的推动，一些大企业积极向乡村腹地转移。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初，位于巴伐利亚州的宝马公司将主要生产基地转移到距离慕尼黑 120 公里之外一个叫作 Dingolfing 的小镇，为周边 100 公里的乡村地区提供了 25000 多个就业机会。

（二）以“村庄更新”提升乡村生活品质

经历了工业化驱动的“逆城镇化”阶段后，德国乡村人口结构已由传统的农业人口为主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为主。把这些人留在乡村，除了就业外，还需要增强乡村绿色生态环境和特色风貌对他们的吸引力。顺应这一时代潮流，1969 年联邦德国颁布《“改善农业结构和海岸保护”共同任务法》，通过补贴、贷款、担保等方式支持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保护乡村景观和自然环境。1976 年对《土地整治法》进行修订，突出保护和塑造乡村特色。1977 年由国家土地整治管理局正式启动实施以“农业-结构更新”为重点的村庄更新计划 (Village Renewal, dorferneuerung)，主要内容是在保留原有特色基础上整修房屋和强化基础设施，使乡村更加美丽宜居。

经过逐步演变，村庄更新计划已成为“整合性乡村地区发展框架”，旨在以整体推进的方式确保农村能够享受同等的的生活条件、交通条件、就业机会。村庄更新计划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农业和就业发展、生态和环境优化、社会和文化保护四方面目标。村庄更新计划主要由政府支持推进，其资金 50%来自于欧盟，25%

来自于联邦政府，剩余 25%由市级政府筹集。当地政府通过土地整治项目，鼓励地主将土地优先卖给政府，以便于整体规划乡村建设，并以此保障为居民提供较为便宜的住房和为产业提供低成本的用地。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在强化美丽乡村共同愿景基础上，以居民广泛参与项目决策、规划设计和自主改造的方式自下而上推进实施，积极引入专业机构提供设计、评估、认证、促进合作等方面支持，形成多方联合参与推进乡村建设的行动者网络。对于私人住宅的改造，采取自主申请、公开遴选、后补助支持的方式给予支持，达到期望要求的私人住宅可以获得 20%-40%的补助支持。一个村庄的改造一般要经过 10-15 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三)以欧盟“引领项目”(LEADER 项目)促进乡村地区综合发展

从整个欧盟来看，乡村人口的减少以及乡村年轻人失业率的提高已经成为一个突出问题^⑨。尽管德国总体上乡村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但德国部分地区的乡村劳动力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的问题也依然存在，尤其是东德地区。比如，在萨克森州乡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只有 15.2%，而临近的下萨克森州因为有大众的带动，乡村劳动力中在非农部门就业的比重则达到 81.3%。德国联邦农村发展项目是联邦政府人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将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提升乡村生活质量以及塑造年轻人的乡村作为其重点。对于缺乏乡村就业机会的劣势地区，德国将欧盟农村发展项目更大幅度地向农村社会发展领域倾斜。从 2014-2020 欧盟农村发展项目计划中，萨克森州获得的支持资金为 113877.67 万欧元，其中用于六大方向中的包容社会与当地发展的支持比例达到了 40.4%，而在下萨克森州用于包容社会与当地发展的支持比例仅为 25.1%。

包容社会与当地发展最主要的项目是“农村地区发展联合行动”项目(LEADER，源于法语 Liaison entre actions de développement rural)。该项目创立于 1991 年，最初是一个区域性农村发展的实验项目，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让当地民众参与农村地区发展的决策和管理，2007 年被纳入欧盟农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不断发展在各地成立了地方性行动小组(lokalen Aktionsgruppen，简称 LAG)，联合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推进农村社会发展。由于 LEADER 项目充分调动了当地民众和各类专业服务主体的积极性，获得比较好的政策效果，在 2014-2020 的项目期内 LEADER 的方法从地区发展项目扩展到所有的欧盟结构投资资金项目中。

(四)以创新发展推动乡村“再振兴”

通过实施村庄更新项目，德国大部分乡村形成了特色风貌和生态宜人的生活环境，乡村成为美丽的代名词。但由于乡村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数量的减少，使得基本生活服务因缺乏市场规模而供应不足，生活便利性下降又导致人口进一步从乡村流出。特别是医疗服务的不充分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卖掉乡村住房到城市居住，现代生活服务设施和就业机会的不足使年轻人越来越难以留在乡村。面对保持乡村活力的新问题，德国又出现乡村“再振兴”的需求。

2014 年 10 月 29 日，德国联邦农业与食品部提出了新的农村发展计划，其目标是支持农村创新发展，让农村成为有吸引力、生活宜居、充满活力的地区。该项目包括四大板块：(1)未来导向的创新战略样本和示范项目。资助农村发展的利益相关者针对特定问题提出创新解决方案，基于专家对这些创新实践项目的评价，为未来农村发展政策设计提出建议，关注的主题包括保障基本服务、改善内部社会发展、增强中小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发展新形式的乡村文化、应对变化与挑战。(2)乡村提升项目。支持 13 个结构劣势区域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增加区域价值和保障乡村就业，为每个区域提供 1500 万欧元支持。(3)“活力村庄”(Kerniges Dorf, Robust village)和“我们的村庄有未来”(Our village has a future)的竞赛奖励。(4)研发和知识的转移，让乡村能够获得创新资源，并支持乡村发展领域的研究创新。为有效推进乡村的进一步发展，德国联邦食品与农业部将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作为其重要任务，2015 年专门成立了乡村战略司。

三、几点启示

中德两国发展阶段不同，农村土地所有制、乡村治理结构、城乡关系等重大制度安排有很大差异，但两国都具有深厚的农耕文化传统，都很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发展问题。从德国促进乡村振兴的做法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均衡的城市化和生产力布局更有利于乡村地区发展。德国走出了一条以小城市和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通过空间规划和区域政策引导工业向小城市和镇布局，为“在乡村生活、在城镇就业”的人口迁移模式提供了可能，带动了乡村地区的发展。我国于1996年迈过30%的城镇化率、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尽管此前一些有识之士已提出“小城镇、大战略”，但在后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各类资源明显向大城市集中，“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预期结果并未出现。特别是此前一些地方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为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创造了机会，但此后随着乡镇企业改制、农村土地转用政策收紧，原先分布在乡村的企业纷纷迁往县、市的产业园区，乡村工业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这种以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为主、农民大跨度转移就业的人口迁移模式，对乡村腹地的带动效果较差。应深刻反思我国的城镇化道路，在基础设施投资、医疗和教育资源布局、土地指标分配等方面为中西部地区县城和小城镇发展创造条件。只有把小城市和镇这个节点做活，才能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效支点。

第二，土地整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德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始终重视乡村土地整治，将其作为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在不同发展阶段赋予其不同功能。早期主要推进农地整治，解决细碎化问题，以利于机械化和规模经营。后来把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作为乡村土地整治的重点。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乡村土地整治中突出景观和环境保护。土地整治不仅需要法律的保障、规划的引领、政府机构和资金的推动，而且需要土地产权人的配合。例如，巴伐利亚州不仅制定了农业结构调整方案(AEP)、土地整治法实施办法、村庄更新实施条例，而且专门制定了土地产权调整条例。德国的经验表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土地利用结构、布局、功能都会发生急剧变化，单纯靠土地市场难以适应这种急剧变化，需要政府以法律、规划、建设项目的方式介入。长期以来，我国也在推进农村土地整治，主要目的是提高耕地质量、增加耕地面积，以及腾退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没有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应赋予我国农村土地整治更完整的功能，将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平台，推动土地整治与农业规模经营、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和环境保护等相结合。

第三，不同发展阶段乡村衰落的内在逻辑不同，促进乡村振兴的策略也必须相应调整。德国作为工业化的先行者，经历了城市化的完整过程，其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乡村发展问题不同，应对策略也有较大差异。特别是在城市化率70%前后，这一点更为明显。此前，主要以农业支持保护对冲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对冲城乡生活条件差异的扩大；此后，更加注重以空间规划和区域政策对冲城乡工业的效率差异，以生态环境和乡土文化对冲城乡生活繁华程度差异的扩大。我国目前仍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应坚定不移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继续降低乡村人口总量和占比。但从现在开始，就要注意改善乡村人口结构，让乡村能够留住和吸引回一批年轻人，以增强乡村生机和活力。为此，要紧紧抓住振兴产业这个核心，为年轻人创造有足够吸引力的职业发展空间；同时，也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年轻人愿意在乡村长期生活下去。

第四，促进乡村振兴需要营造社会氛围。德国不仅通过颁布《土地整治法》《农业法》《联邦空间规划》等法律法规、实施村庄更新计划和欧盟“引领项目”等投资建设活动以促进乡村振兴，而且注重为乡村振兴

营造氛围。例如，在民间自发开展乡村社区美化竞赛的基础上，1961年联邦德国农业部将其转化为全国性的乡村竞赛制度，每三年举办一届“我们村庄更美丽”竞赛，2007年更名为“我们村庄明天会更好”竞赛，从注重外在美转向注重内涵美。开展这个活动，既引起全社会对乡村发展的关注，也有利于激发各个村庄建设美丽家园的积极性。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自发开展了美丽乡村、星级农家乐等评比，最近农业农村部也在推动开展“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应借鉴德国经验，对这些活动进行统筹谋划，围绕现阶段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设计赛事内容和规则，提高活动的实效性和影响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研究”课题组

课题顾问：王安顺

课题负责人：叶兴庆 张云华 金三林 执笔：叶兴庆 程郁 于晓华

注 释：

①本文涉及到的二战后德国分裂至1990年两德统一之间的情况，以原联邦德国为主

②2011-2016年，欧盟28个国家乡村人口减少了1.2%，乡村15-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在5.3%-47.4%之间

③执笔人叶兴庆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部部长，程郁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第一研究室主任，于晓华工作单位为德国哥廷根大学农业经济系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厅)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各研究所

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卢继传

副 主 编：辛 梅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电 话：010-59193366 59195293

010-66117652 57206299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16号楼、18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邮 编：100125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3楼、4楼

